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地宫是我国古代建造佛塔盛行时对佛舍利子瘞埋制度的产物。它发源于古印度,大约在东汉末年,佛舍利子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弘扬,而被一些西域来的高僧携带入中国。位于我市花果山景区大圣湖畔的海清寺塔是否建有地宫?若有,地宫内有可能藏了些什么?请看刘凤桂撰写的《地宫——大村海清寺塔的待揭之谜》。

在苏北广袤大地上,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河,穿行于赣榆县与东海县之间,这条河名谓新沭河。她是一条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大河。说其古老,因为河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大沙河;说其年轻,是因为新沭河沿用大沙河故道,其名仅诞生几十年。那么,大沙河为什么要更名为新沭河?孙铭的文章《古今沧桑大沙河》从大沙河的历史渊源、大沙河的变迁与地名的衍生、导沭工程与区划地名的变更等方面,将这段几近尘封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

朱瑞,江苏宿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人民炮兵的奠基人。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不幸触雷牺牲,年仅43岁,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1942年3月,时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瑞随八路军115师师部转移至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原属山东省临沭县管辖),并在此战斗、工作、生活长达数月之久。在西朱范村期间,朱

瑞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与罗荣桓等领导同志一起,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军队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详见《朱瑞在西朱范》。

今年是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同志遇难牺牲70周年。符竹庭同志是在1943年11月解放赣榆城后,在日伪的偷袭战中受重伤而牺牲的。据公安部门揭秘的尘封档案记载,日伪突袭符竹庭部队驻地,原是早有的一起预谋。那次战斗是在伪赣榆县警察局特高股股长冯宝岩策划和带领下发起的,冯宝岩是致符竹庭等人牺牲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冯宝岩被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武工队列为重点对象待机抓捕,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形,一直未能如愿。直到符竹庭牺牲16年后的1959年,冯宝岩才落入法网。详见《杀害符竹庭的凶手冯宝岩落网记》。

陇东火柴厂曾经是我市知名企业,上世纪50年代末已经是陇海铁路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火柴生产企业,并逐渐成为我国火柴生产的重点企业之一。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打火机的普及,火柴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偶尔会在酒店、宾馆一睹她的芳容。解放后,曾作为全市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的陇东火柴厂,她的创始人是谁,企业是如何逐步发展壮大?如今陇东火柴厂的境遇何如?详见《陇东火柴厂的那些事》。



P6 吴成林将军在空军甘巴拉雷达站视察



P 31 陇东火柴厂生产的“花果山”牌火柴商标



P37 化腐朽为神奇的美食——板浦豆丹



P48 张振汉浚云河碑

目

■ 港城将星

吴成林将军——心系蓝天写忠诚 朱延松 04

■ 历史考证

地宫——大村海清寺塔的待揭之谜 刘凤桂 07

五羊湖的沧海桑田 蒋金明 09

五图河溯源 蔡立志 11

■ 地方文化研究

古今沧桑大沙河——大沙河变迁与地名区划的变更
..... 孙 铭 12

蜚声海内的徐氏医学世家 伏广喜 16

商相伊尹传奇 黄正明 19

水利专家武同举与《江苏水利全书》 陈 炜 22

■ 峥嵘岁月

朱瑞在西朱范 王晓华 23

我的父亲柏广恩 柏建芳 26

■ 往事追忆

陇东火柴厂的那些事 陈 婕 姜松林 30

■ 史海钩沉

杯茶未扰 白银四万
——清代海州府科举考试管见 薛明光 32

杀害符竹庭的凶手冯宝岩落网记 祝新华 34

录

■ 红色纪念地

赣榆战役纪念地 本刊编辑部 36

■ 民俗风情

板浦豆丹 潘友国 37

■ 风物览胜

海州文庙乡贤祠 张树庄 39

溯史读志话羽山 时麟 42

徜徉吕母遁岛处 吴成芳 45

连云港市治水碑(四) 张卫怀 47

■ 封面

湖光山色·塔山水库



小塔山水库位于赣榆县西北部塔山镇境内,是苏北第二大人工水库,建于1958年,总库容2.8亿立方米。西依沂蒙山余脉,北有赣榆最高峰大吴山,主坝建于小塔山与子贡山之间。集水面积386平方公里。库区人文景观众多,主坝西端的子贡山端木书台、端木书院遗址至今尚存。库名由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书法大师舒同书写。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江行舟 刘畅征
许燕鏊 杨春生 李洪甫
张学贤 张良群 彭云
韩世泳
主任:李东
副主任:张斌 朱瑞 赵廷旗
陆瑞萍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忠新 王滨 刘鹏
邱仕明 何洪斌 姜龙才
郝芳 董恕志 韩翠林
主编:李东
副主编:张斌 朱瑞 赵廷旗
陆瑞萍
责任编辑:邱仕明 张伟敏
文字总校:张俊鹏

2013年第4期总第88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222006
网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吴成林将军

——心系蓝天写忠诚

朱延松

人物简介：

吴成林，1952年出生于灌云县侍庄乡吴王村，1969年3月入伍走进新疆马兰，一干就是20年，后调陕西临潼、乌鲁木齐、徐州等地任职，从事军队后勤工作。40载的军旅生涯，吴成林由一名空军地勤战士，成长为地勤机械师、连长、场站站长、基地后勤部长、军后勤部长、徐州空军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副院长。2007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戈壁深处，口饮黄沙砺壮志

电影《横空出世》中所展示的国威，每一位国人都会心潮澎湃。如若细心解读影片的每一个镜头，你就不难发现，地处茫茫戈壁深处的马兰当年，环境是何等的恶劣。维语中戈壁，即不长草木的地方。“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长年难见雨，风吹石头跑。”据吴成林将军描述，当年军列西行中，满眼是荒凉沉寂的戈壁与浩瀚无垠的沙漠，在这死神也望而却步的生命禁区里，偶尔能从高大的沙山上，见到裸露的不知何时留下的野骆驼骨骸。面对着原始、蛮荒的“死亡之海”，新入伍战友曾心生好奇，很大的车窗仍不够用，轮换的面颊，嘈杂的话语，看得出大家很兴奋。

进驻马兰军营后，漫天飞扬的黄沙总跟战友过不去，饭碗中、床单上、军服口袋里，甚至是呼吸的

空气里，无处不在。加之整天口干喉燥，大家的情绪马上出现了大逆转。为了激励大家扎根军营，连队组织革命传统教育课，从公元前汉朝大将军霍去病为击溃匈奴进军茫茫戈壁，到基地建设初期，科学家、将军们与战士一起在黄沙上住帐篷，饥餐沙粒饭、渴饮苦水浆。因缺水，清晨毛巾湿角揩一下双眼就算洗脸，一年没洗一次澡，到如今营房成片，白杨成林，蘑菇云升天，全世界震惊。

基地领导的现身说法，更让新战友心悦诚服。“沙漠每年都有一两次强沙尘暴，记得1958年9月的一天，我和通信员正在野外执行任务，只见天空中蹿起黑色沙云，瞬间，烈风摇簸，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我们两人卧倒在地，抱在一起，沙魔肆虐地欺凌，沙石噼里啪啦无情地击打，好痛好惨，我是真正领略了大自然的严酷和淫威。等风沙平息，天已经黑了，我就像一个死里逃生归来的孩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帐篷支起的家，可帐篷顶盖和被褥已被大



风卷走了。那时候，煮好饭菜遇到风沙没法吃，饿极了就只有蒙在被子里吃几口。饭里有沙，不敢合牙，囫圇吞咽。平日吃饭，没有青菜，只是干菜和蛋粉。馒头冷了，拾些干柴禾烤着吃，烤热一层剥一层，吃完了，对着军壶喝口水。大家都说，烤焦黄的馒头吃了能治胃病……”

受到老一辈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吴成林暗下决心：扎根马兰，苦练技能，为祖国，愿一辈子戍守边陲。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在后来 20 年的基地飞行保障岗位上，多次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并从一名优秀的战士，逐步成长为连长，直至场站站长。

精磨铁杵，满手老茧即“勋章”

刚结束新兵训练，吴成林就参加飞机修理培训。面对复杂的仪表数据、飞行参数、涡轮发动机等机械原理，对在“文革”中学“培养”出来的吴成林来说，难度可想而知。看过电影《决裂》的人，应该不会忘记那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照样成为象牙塔里的“高端人才”。吴成林也是带着那样引以为豪的双手走进军营的。据他介绍，在参加机修培训的那段日子里，这双手没有让他自豪，自己的知识太贫乏，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为了熟悉飞机上的每一个零部件，弄明飞行原理、产生故障原因，他连一个完整觉都没睡过。光基地几种机型的结构草图，他不知在学习笔记上画过多少遍。因为他深知：作为一名机修兵，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自己的工作岗位与祖国的科研事业紧密相连，一个细小的失误，可能带来的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为了激励自己，他把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语录抄写于床前，每天一起床，先诵读几遍，然后就抱起书本继续苦读。

对爱好兵器的年轻人来说，都知道今天的国产战斗机有歼十、枭龙系列，性能不比国外先进机型差，还批量出口好多个国家。然而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期，国产飞机大都是仿制品，质量的确不高，所以保障飞行的任务相当繁重。回忆起当机修兵的日子，吴成林十分感慨：飞机上有的零部件损坏，没有一个备用的存货，要用手工重新锻造。如果锻造出的精度不合要求，如少了一块垫片、丢进一个小扳手或是小抹布，那飞机就上不了天。要是在寒冷冬季，马兰气温一般都在零下 20 多度，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机修战士要穿单衣爬进涡轮机中去修理。修好了飞机，人几乎冻成冰块，手上冻裂的口子周围，都是结成块状的污血。就是凭着这种

奉献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吴成林与战友们让基地的每一架飞机翱翔蓝天。当初曾被怀疑过的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践历练，变得更为厚实，这老茧不仅是智慧的结晶，更是保障战机飞行的荣誉“勋章”。

马兰花艳，千锤百炼“兄弟连”

马兰，多么动听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的由来，主要是因为这里到处盛开着马兰花，她生命力最强，笑傲茫茫又荒芜的戈壁。马兰花更是战士们最爱，种养在窗前、院内，要是谁立功受奖，献上的必定是马兰花，就连寄回家的照片上总少不了马兰花。

1969 年 3 月入伍来到这个神秘地方的吴成林，一干就是 20 年。从战士到连长，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奉献着青春年华。据吴成林回忆，当连长带兵的日子最艰苦，连个星期天、节假日都没有。天一亮出操，白天训练，晚上查岗查哨。作为飞行保障连队，吴成林将日常工作细化为每个班排的具体行为，要求做到整体协调过硬，同时对每个岗位、每个单兵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就连机场的每日清扫，他都严格把关。什么样的领导带出什么样的兵。吴成林的连队，班子过硬，官兵团结，士气高昂，在军事技能、行管安全、支部建设等评比中年年第一，先进连队、先进党支部的锦旗挂满墙壁。用吴成林的话说，战士们在他胸前插马兰花不知有多少次。

军人，远离故土，戍守边关，就意味着抛妻别子，就注定要与寂寞相伴。尤其在大漠深处，在每年 4-7 个月风沙漫天飞舞的季节里，战士们整天营区、训练场、宿舍三点一线，生活单调、枯燥，情绪极易烦躁，常因一些小事而发生纠纷，甚至大打出手。对此，吴成林在严格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性关怀、以情带兵。一方面组织革命传统教育，品味大漠革命前辈“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奋斗精神，一方面与战士谈心拉家常，组织沙漠篝火晚会，爬上圆润的月牙形沙山，看沙漠日出日落……年轻战士的心灵总是充满缤纷的色彩，充实的军旅生活，更激起大家对幸福、爱情、理想和信念的向往和追求，在部队文娱晚会上，一个战士在朗诵给远方女友的爱情诗中写道：“我站在戈壁凝视远方，心中默念着我的姑娘。你那默默无言的期待，我牢牢记在心上。你那明媚的眼睛闪着光，它使我更坚定地献身边疆。大漠‘横空出世’的惊雷，就是我们爱情的礼花绽放。”



激情四射, 岗位变换建奇功

从连队到指挥机关, 吴成林先后担任参谋、副参谋长、参谋长, 身份的变换, 意味着工作更加繁忙。据他介绍, 参谋长要分管各种业务, 要站在全局高度, 搞好组织、计划、协调。士兵出身的他, 总是有着一股子冲劲、闯劲, 他精力充沛, 不知道什么叫累。在部队管理、作战、训练、后勤、飞行保障等工作, 件件出色, 多次受到总部、军区表彰。1991年9月, 在任陕西临潼场站站长期间, 凭借在军械保障正规化管理的创新做法, 得到参观首长们的一致肯定。临潼场站被评为空军外勤保障先进单位, 成为空军部队推广的先进典型。



吴成林(中)在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空军甘巴拉雷达站视察

吴成林的工作始终充满激情, 在担任基地后勤部长、军后勤部长时, 一年总有大半时间在基层。据他讲, 南疆、北疆、东疆的每一个雷达站, 他每年都要跑一遍。未到过新疆的人不知新疆之大, 吴成林每一次下基层, 一跑就是一两个月。有一次, 他从乌鲁木齐到阿尔泰, 刚出发时还是晴空万里, 可到了半路上先遭遇大风沙, 接着就是漫天飞雪。为了确切了解基层场站的实际情况, 他与同行的同志在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像这样的情况, 每年总会遇到一两次。对此他说, 边远场站的战士生活更为艰苦, 冒雪到部队慰问, 给战士不仅是物资上的支持,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和心灵上的慰藉。记得一次去塔城, 夏日上山, 冰雪还未融化, 道路难行。上山后, 战士们列队欢迎。这里每年的秋季大雪就封山, 冬天长达10个月, 考虑到这里的条件艰苦, 每年慰问都把它作为重要一站。

丰富的部队工作经历为吴成林在院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任职徐州空军学院院长期间, 他带领党委一班人, 深刻分析学院建设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正视差距, 找准定位, 彰显特色,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在抓好学院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改善的同时, 更加注重内涵式、可持续性发展。学院提出要着眼部队需要, 从实践实战出发, 紧贴空军信息化建设和航空兵作战保障实际, 突出航空兵作战后勤与装备保障特色专业群建设, 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不断加大教员队伍建设力度, 努力为部队培养输送集知识、能力、素质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今天的课堂连着明天的战场。吴成林经常对教员们说, 在教学内容上要着眼航空兵作战保障、大联勤体制改革以及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新要求, 努力提高学员的岗位适应率; 人才培养要逐步从研究型向应用型转变, 要突出实践教学、现地教学、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 让问题、经验和科研成果进入课堂, 注重提高学员的综合能力。正是他在教学改革上的锐意进取、不断创新, 使徐州空军学院驶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在全军院校激烈的竞争中独树一帜, 毕业学员岗位适应率年年攀升。据了解, 该院2006年一年培训各类学员2000多人次, 98%的毕业学员达到了“上岗即适应”的目标, 大多数毕业学员到部队不出一年就成为业务骨干。在总部组织的全军院校教学工作评价中, 徐州空军学院获得了优秀的好成绩。

2006年后吴成林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副部长、部长, 200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副院长。

40多年来, 吴成林从一名普通士兵, 成长为一名将军, 在岗位的转换、职位的升迁中, 他始终保持一名军人的本色, 用满腔热血激情书写对祖国蓝天国防事业的忠诚。他成长的辉煌历程, 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更为强势崛起的港城乃至成长中的下一代, 馈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采访结束时, 吴成林将军十分动情地说, 连云港近几年的发展变化太大了, 让我们每一位在外的连云港人备感振奋。希望家乡父老乡亲,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抓住江苏沿海大开发的契机, 用智慧和汗水,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地宫

——大村海清寺塔的待揭之谜

刘凤桂

连云港市海清寺塔是否有地宫?《文物》1981年第七期,由已故文史专家刘洪石先生撰写的《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出土记》是这样回答的:

根据已发表的镇江甘露寺铁塔、苏州灵岩寺塔、河北密县法海寺塔的报告,塔中文物大都是在塔基里发现的,就是说,在建塔之初瘞入地基的。而海清寺塔的大批文物却在塔心柱发现,这就目前的资料看,还是个先例。据塔第五层嵌的碑文记载,该塔并非一次建成,从天圣元年至天圣九年,时建时停,一边化缘,一边施工。我们认为该塔塔底应有“地宫”,并有第一次(天圣元年)瘞入的功德。

地宫是我国古代建造佛塔盛行时对佛舍利子瘞埋制度的产物。释迦摩尼佛灭度后,遗体火化结成舍利,弟子们将舍利子分贮于当时印度的诸多小国。孔雀王朝阿育王统一印度后,大力弘扬佛法,将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使诸鬼神于南阎浮提分送世界各地建塔供奉。阿育王时期所建的供奉佛舍利塔,作为一种纪念性建筑,梵文音译窣屠婆(stupa),原意是坟墓,在中国的传承历史过程中,与中国木结构建筑相结合,成为楼阁式建筑。“塔”字是南北朝以后所创之字,并根据其译音而简读若ta。它发源于古印度,最初形象只是一个半球形体,状似馒头。大约在东汉末年,佛舍利子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弘扬,而被一些西域来的高僧带入中国。受笃信佛

教的上层统治者认同,仿阿育王时期的舍利塔形制而建塔供奉之。山东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第三石第二层画面中有一古“窣屠婆”形象,乃一半圆状建筑,上有一颗常青树状塔刹,这可算作我国最早有关塔的形象记录。但至今尚未发现东汉——三国时期塔的建筑实物考古资料。

从文献方面看,据唐代高僧道世(?—683)《法苑珠林》记载,中国自西晋时(265—316)建会稽郡鄞县(今浙江宁波一带)塔始,至隋(581—618)魏州黄县(今河南密县)塔止,越三百五十多年间共建19座安奉佛舍利宝塔,其中东晋时期所建的金陵寺塔位列第二。它的全部秘密现已被考古发掘所揭露。2007—2008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明代大报恩寺遗址出土了地宫、石函、铁函以及四枚佛真身舍利和十颗感应舍利子。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一尊七重阿育王宝塔,高近1.2米,由水晶、玛瑙、琉璃灯宝石镶嵌,木质为胎,银皮蒙覆,表面鍍金,塔身四周浮雕佛教人物故事。根据地宫北壁嵌的石板镌刻的《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长篇铭文,时代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铭文称:塔内地宫藏有“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槩,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口函安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了地宫所藏确如铭文所言。其瘞埋方式是:地宫中安放石函,



石函内盛置铁函和阿育王七重宝塔。铁函内盛放有数千枚的汉代五铢至北宋至道元宝、咸平元宝等各式铜钱，琉璃瓶、银鍍金莲花如意形法器、铜镜和20余幅珍贵的宋代丝织品；最为珍贵的是上面提到的阿育王七重宝塔及用于供奉佛和诸圣舍利的楠木刻须弥座，上置银椁，银椁内为金棺，金棺内为10颗佛真身舍利，另外有佛顶骨和诸圣舍利。这批极为珍贵的佛真身舍利上可追溯到三国时吴帝孙权为来华的康居国僧会所建的金陵建初寺和佛精舍阿育王塔。金陵建初寺东晋时更名为长干寺，南朝时梁武帝大同三年（537）更名为大长干寺并改建阿育王塔，重新盛置并瘞埋原来的舍利子，并增添了一批舍利。共分成两份，分藏两塔地宫，除藏于金陵长干寺，另一批藏于镇江甘露寺。安奉舍利装在金瓶中，外又是玉瓶，放入小七宝塔，再装入石函。这个“小七宝塔”就是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明大报恩寺塔地宫发掘出土的阿育王七重宝塔。

无独有偶。2007年爱国人士王崇仁先生自海外请归的早年从北方黄河沿岸某地流失的“五重宝塔”，由大小递减、层层套装的石塔、铁塔、鍍金塔、金塔及四尊单体石雕天王立像组成。佛教界专家认为从形制上判断，它们为辽代皇家所制，藏置于某一大塔的地宫中。五重宝塔高1.74米，制造年代在宋辽之际，更具体地说，在辽统和——重熙（983—1055）年间。

《佛舍利五重宝塔》一书讲到自隋唐以后，我国佛界对真身舍利的瘞埋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地宫中以石函、金棺、银椁安置舍利；一种是在地宫中以多重宝塔的形式来安置舍利。以法门寺为例，唐代多为第一种方式，晚唐以后五代、辽宋时期则多为第二种方式。我们举以上两个例案，意在说明宋代佛塔地宫中的石函或铁函内瘞埋藏置佛真身舍利的做法正是第二种方式的普遍性所在。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类似上述瘞埋方式，自隋代开始至唐宋时期的佛塔，解放后，计有1960年发掘的镇江甘露寺塔下石函、1964年发掘的甘肃泾川县建于唐武则天时期的大云寺塔地宫、1969年发现的陕西耀县隋代舍利塔石室等共9处。佛真身舍利置放于佛塔地宫石函中的“阿育王塔”内有5处。

清《嘉庆海州志》载《柳峦记谒》记述了柳峦当

时作为海清寺的修塔总管和尚，纠合“同会弟子”史玩等6人以及潘靖等信众9人，各出钱粮若干，举办“修设感圣恩起塔大斋一十三会”，成功地“在会转化千名”信众，“赴斋施主每名钱一百文足”，用于“添兴释迦真身舍利阿育王灵牙宝塔”。根据上述例举，这尊“释迦真身舍利阿育王灵牙塔”，应该是当时用于瘞埋在海清寺塔地宫中的舍利塔，而非指尚未建造的九级八面“感圣恩”而起的海清寺塔。何谓“添兴”？添兴者，增加建塔之气势也。也就是说要在建海清寺塔之外，通过在其地宫瘞埋“释迦真身舍利阿育王灵牙宝塔”来提高即将开工的海清寺塔的名誉。

海清寺塔奠基，即是在已建好的地宫上构筑塔的基础。若参照宋长干塔的地宫形制，应为竖井式。建造时，一层石块一层土，累积夯筑。达到一定高度时用一方形石覆盖于地宫顶部中心位置。宋长干寺塔建造年代是宋大中祥符四年，即公元1011年，离海清寺塔建造的宋天圣元年（1023）相差仅12年，应属同一个时代的、同一风格的古塔建筑，前者高可以推测为78米，后者高约42米。海清寺塔地宫与宋长干塔形制皆为九层八面。地宫中的瘞埋物，推测应该就是《柳峦记谒》中说的“释迦真身舍利阿育王灵牙宝塔”。亦即刘洪石先生分析并推断的“第一次（天圣元年）瘞入的功德”。至于在塔心柱发现的石函、铁匣、银棺、鍍金银棺、银方匣、银精舍以及佛舍利等大批文物，只能是一个“先例”，其石函外周浮雕虽然颇具盛唐遗风，很有探讨的必要，但不能据此作为柳峦碑谒所谓“大唐第二之尊”的物证，当然也不妨碍对海清寺塔应建有地宫的推测。故当我们无缘发掘海清寺塔地基之前，它是一个悬案，或可称作待揭之谜。

最后，我们还想纠正有关塔名上的误解。一般俗称的“大村塔”其名字应该叫：宋海清寺塔，而不应该叫阿育王塔。所谓阿育王塔是指瘞埋在地宫里盛置佛舍利的小塔。古代寺院所建之塔一般随寺名而定，如梁武帝时的大长干寺塔，明南京报恩寺塔，等等。

（作者单位：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五羊湖的沧海桑田

蒋金明

历史上的五羊湖主要是指东至大板桥,西至虎山西,南至中云台山,北至北云台山,东西长二十多里,南北宽四五里不等的海峡。五羊湖得名于中云台山北的云门村山下,有五块石头在大自然鬼斧神功下造就成羊形。此五块石形体像羊,栩栩如生,在云门村羊祥(村)组山根路边。据云门村老人回忆与《云台导游诗钞》张百川记载,其中两只石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地方修路时毁去,现在三只石羊还在。五羊湖何时得名?现无从考证,查古海州历史时,发现清朝《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志》均有五羊湖的记载,其中介绍万金坝:“东海编七里兵田,常被海潮,从此淹漫。原名五羊湖,嘉靖间,有太监刘荣者,本东海所舍余,立坝遏潮。”由此可知明朝嘉靖年间,这里的海峡已经叫“五羊湖”了。距今400多年前五羊湖已成名,可见它名声更为久远。

秦汉以来,从有记载历史可知:五羊湖底有三次干涸:

一次是从隋开皇九年(公元585年)修西捍海堰,到唐朝日本园仁和尚过捍海堰(公元839年),历经254年。

第二次是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即公元1394年重筑万金坝,到明朝隆庆六年,即公元1572年,海水又将五羊湖底淹没,历经178年。

第三次是从1836年五羊湖已为平地(见《云台新志》),至现在,经177年。

古代的五羊湖实际是海,200年前,湖东与大板桥东的大海相连,湖西与虎山西海州湾相通。大海何时升至云台山下的呢?据已故的地方文史专家张传藻先生研究,云台山下大海升高于秦汉时期,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其中在战国以距今2200年海水上涨,海岸西进至西汉(距今1800年左右)达到高潮(张传藻《连云港地理与经济》319页)。”《史记》曾介绍西汉初年,汉打败齐国,最后齐王田横率五百将士逃至“彭越封地”(位于今河南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当时汉兵迫近,为求保实力,田横决定到郁洲,那里海中有多座山,是他理想屯兵之地。于是逃至即今云台山,在今中云地区金苏村南山安营扎寨,并用大石筑城,2000多年至今,城墙还在,可谓是历史的见证。《史记》说田横逃至海岛,这说明汉朝初云台山下是大海。

到了隋朝,“西捍海堰在东海县(南城)北三里,南接谢禄山,北接石城山(指墟沟),南北长六十三里,高五尺。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造(《嘉庆海州志》P599)。”《嘉庆海州志》又载:万金坝“《张志》去东海城东北七十里。南北长四里,东西阔三丈。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筑……后废。”根据这两条捍海堰建筑,说明隋朝时五羊湖底已露出地面,只有露出地面才可能筑堰坝,可见隋朝时海平面较低。

到了唐初,公元839年,有个日本和尚叫园仁,来唐朝求法,详细记录从高公岛上岸,经宿城,至白果树(取盐处),过五羊湖去东海县(南城)。“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只是“泥深路远”。他没有坐船,也没有涉水,是陆路过五羊湖,这说明过五羊湖应是走旱堰,可以想象出那时海面与湖底略低或持平,如果海水较高,东西海浪两面撞击土堰,堰路是存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说唐朝初至中期海平面与湖底持平或略低是有可能的。



到了宋朝,海平面上升。锦屏山的东面刘志洲山,山下有宋朝码头遗址。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当时海州地区最大港口。北宋末年,刘志洲山下曾是北宋有名的李宝水师演练场所,北宋战败后,又是金人水师演练场所。这时是宋与金争夺海州的公元1127年前后。连云港考古专家高伟先生对刘志洲山考古发现,码头附近的山坡上有十处船型岩画(见高伟《岩画迷踪》),其中还有金人刻的船型岩画和文字记录。这说明是宋朝和金朝水师双方活动的产物。锦屏山东的刘志洲山下已是海面,现在可以想象出,宋朝时期海平面是相当高的,那云台山下的海面将是白浪滔天,五羊湖水面也是如此。

到了明朝海平面又有新的起伏变化。据《嘉庆海州志》“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重筑(万金坝)。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知府才宽大修。《陈志》东海编七里兵田,常被海潮,从此淹漫。”又载五羊湖“内产芦苇,鱼蟹之居”。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海州志》水利条目中提到“东海诸浦皆沃壤也,今则海水淹没。”明朝期间,在五羊湖旱堰修筑中,可以看出,明初即1394年在湖中重筑旱堰,说明湖底裸露出来,海平面较低,到1503年,过109年县知府给予大修,湖里已有七里多长的粮田,这说明明朝中期五羊湖的山根能种庄稼。但常被海潮浸漫,后全荒废。可见海水逐渐上升。到1572年,仅过70年,原先显露出来的肥沃土壤又被海水淹没了,说明明朝海面上升之快。五羊湖又成波涛汹涌的大海。

明朝后期海水上升影响到清朝,《云台新志》:“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海涨沙淤,渡口渐塞,至五十年(公元1711年)忽成陆地。”从这里可知1711年海平面升高,而后忽地又下降,特别是1668年郟城大地震后,海水大踏步后退。五羊湖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6年),是清军水师阅兵练武之场所。据五羊湖边的中云江庄村江氏族谱记载,1790年湖水离南山根有300米远,东部大海至云门村碎石湾处。道光初(公元1821年),湖面渐小。两江总督陶澍偕同地方官员在湖面上检阅水兵。

据1836年成书的《云台新志》介绍,到1836年时,五羊湖已为平地。

历史上湖内有两条捍堰基础,一条是西捍海堰基,另一条是从云山乡白果树村至中云江庄村的,称为石堰(上世纪70年代白果树村修水利,从地下挖出许多自然山石,石上还结集许多贝壳)。1836年五羊湖虽然成为陆地,这两条堰基础存在使湖水滞留在湖心排不尽,在今云山江二跳和中云江庄村西部湖底(即石堰西部)留下大水面,江庄人称这水面叫“西湖”。

1850年前,小板桥东部产出大量海盐。《云台导游诗钞》作者张百川在该书“五羊湖归帆”一文中这样写到:“自清咸丰元年(即公元1851年),商人挑半边河运盐,湖水出东入海,湖遂涸。”垣商为了把东部盐运出,挖开堰基,运输盐船边行船边扒捞河道,后来把这条运盐扒成的河叫半边河,即今运盐河的前身。同时西捍海堰基挖开,湖内东西运盐通畅。湖心通畅,海水迅速淌干,五羊湖彻底不复存在,只留下空名。这里还须强调说明,《云台导游诗钞》作者是今云台山朝阳人,住所离五羊湖中心位置不过十里,对五羊湖何时干涸这一敏感现象会认真探讨,五羊湖周边有十几个村庄,他将各村庄环境详细记录下来并付诗成文,逐村调查五羊湖知情者,便写出“湖水出东入海,变为陆地,今已扬尘七十余年”。从中可算出这是张百川上世纪二十年代写的文,五羊湖后期“西湖”中水彻底干涸时间是从1851年是可信的。

五羊湖中堰埂阻流水外流,堰埂扒开后海水淌干,又经过100年,特别是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人民搞农田水利,在五羊湖中东西挖了两条大小排淡河,又在中云台山根,西从黄九堰,东至云门村东挖一条东西长7里的石墙河。排淡河南北挖了无数条大的排水沟,又搞农田水利配套,土壤改良,使五羊湖底变成了米粮仓。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级开发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五羊湖地区成立,又将粮田变成工厂。现在工厂、居民楼房林立,道路纵横,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作者单位: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五图河溯源

蔡立志

五图河横贯灌云县东部,上游于小潮河处相接东门河来水,穿图河乡境而过,然后向东北行进 25 公里,在洋桥农场入黄海,是大伊山向东排洪的干河。什么叫“图”?“五图”又是什么概念?五“图”是怎么分布的?五图河的走向与五“图”有什么关系?

“图”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辞海》定义:图,用线条、颜色显示出来的事物形象,如地图、河图等。《辞海》对图的解释还列有一条:即图为旧时区划地方的单位名称。接着在“图董”辞条里解释道:“图董亦称图长。中国旧时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公职人员。在田赋征收行义图制的地区,义图制经办人。”由此可见,图是一个行政区单位。在行政区划的序列中《辞海》说得很清楚:图,“源于明甲里,清南方各省,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董,图设图董,总管一乡,一图事务。另有图正,管本图鱼鳞图册。清图以下分十庄,每庄有庄首若干人,轮流年值,核收全图田赋”。由上文可见,图的行政体制设置于清初,只在南方实行,海州当时属江南省,可能有此设置。我们从灌云、灌南县五万分之一地图上可以查到,一到五图的地名。一图在灌南县长茂镇,为一图村;二图地名在一图东北;三图在灌云沂北乡;四图即为灌云县的图河乡驻地,五图为五图河农场驻地。一至五图从西南向东北,基本呈直线等距离分布。为何如此分布?笔者初步分析,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从一图至五图区域内,地势相对较高,在一片沼泽地中,这样的区域就成为人们落户的首选,因此依次建立了一图到五图。

五图,形成行政区划单位的设置时间起码应在清乾隆初年。《连云港市水利志》记载:“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两江总督高恒上奏:海州沭阳地处海滨,地势低洼,众流所趋,请浚下游入海诸河”。“是年挑浚车轴河、五图河等。”

五图河,在清代历史地图中,其走势就如现在

走势,西于小潮河处与源于盐河的东门河相接,过三图、四图、五图,转向东北洋桥农场处入黄海。由此可见,五图河并未经过一图和二图,既然如此,为何还叫五图河呢?最简单的回答是:经过五图的河,就称五图河好了。这就是五图河名称的由来。

五图河自诞生之日起,就为大伊山地区向东排洪的干河。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挑浚后,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淤塞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又对五图河及东门河进行疏浚,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完工。此间,海州府为了促进五图河两岸的开发,在五图河两岸,西自四图向东,至现十段以西,每隔 2.5 公里挖爽碱沟一道,南北各 8 道,共计 16 道,以促进爽碱,加速开发。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工賑,用银 4 万两,挑浚五图河,清末民初,五图河两岸已成沃土。

民国 28 年(1939 年)8 月 30 日夜,黄海发生海啸,海堤冲决,五图河两岸南至灌河南,北至车轴河北,东西 30 多公里的地方尽成泽国,潮水 3 日始退,沿岸居民淹死千余人,4 万多公顷耕地沦为盐碱荒滩。此为灌云县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特大自然灾害。民国 37 年(1948 年)11 月灌云县解放,1949 年 10 月份开始导沂工程,11 月 7 日五图河疏浚工程开工,动员民工 18648 人,11 月 19 日完工。到 1978 年 3 月 25 日,人民政府 8 次疏浚五图河,使五图河底宽由原先的不足 10 米,逐步扩大到 15 米、30 米、直至 65 米,河底高程由原来的 0-0.3 米,加深至 -1.1—-1.9 米,3 次修筑五图河入海闸。

自 1978 年以后,五图河两岸排涝形势大为改观,再没有发生大的涝灾。五图河成了灌云县东部人民的幸福河。

(作者单位:市委农工办)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古今沧桑大沙河

——大沙河变迁与地名区划的变更

孙 铭

在苏北广袤大地上，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河，穿行于赣榆县与东海县之间，这条河名谓新沭河。新沭河自山东省临沭县大官庄胜利堰至海州湾内的临洪口，全长 80 公里（山东省境内 20 公里），流域面积主要在江苏境内。然而，她是一条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大河。说其古老，因为河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大沙河；说其年轻，是因为新沭河沿用大沙河故道，其名诞生仅几十年。那么，大沙河为什么要更名为新沭河？1949—1952 年，国家实施“导沭”入海工程，该工程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水利工程，即在山东省临沭县大官庄处腰斩马陵山，分沭水入大沙河东流，至临洪口入海。导沭工程竣工后，将大沙河更名为新沭河，并以新沭河为界，将新沭河以南原属赣榆县区域内的大片土地和原隶属于赣榆管理的部分村庄划归东海县。从此本是赣榆县内河的新沭河，就变成了赣榆县与东海县的界河。虽然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名的变革，已成为历史而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但是这一重大事件却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大沙河的历史渊源

大沙河历史悠久。《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对大沙河的解釋是：“大沙河源自江苏赣榆县西羽山，东流入海，入海处在临洪口、青口之间，称大沙河口”。

历史时期大沙河镇因古大沙河（今新沭河）穿境而过而得名，现称为沙河镇。根据旧县志记载：“大沙河，旧名庙湾子沙河，去治南五十里。源自山东郯城县，经大沙河镇东流入海，雨集水涨，商船可行。”

大沙河的渊源，根据《赣榆县志》记载：“大沙河上源有南北两支，北支源自马山，南支源自郯城县大沙河镇，在石梁河村东北汇合东流，至沙河镇东又分为南北两派，至临洪镇东合而为五龙河入临洪口，全长 50 公里，流域面积 620 平方公里，河道上游浅而宽，下游窄而弯曲多支叉，屡屡与朱稽河、蔷薇河同溃”。很早以前，大沙河一带就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山东下来三条龙，两条死龙是害虫，一条活龙福无穷”。两条死龙是指龙河、青口河，只泛滥，不改道，活龙是指大沙河。大沙河源自山区，落差大，水势猛，流经沙河镇地势趋向平坦低洼，屡屡改道，大水过后，不仅沉积大量的泥沙，而且还留下一层肥料，化作一片良田。可以说现在沙河镇的相当一部分土地都是大沙河的造化之功。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大沙河镇，……枕冈带河，居民数千家，商贾所聚，集以二、七、五、十为期。镇多州民寄居，知县樊兆程请于大府，令受县铃束，州不予理”。以上所说的樊兆程为明万历年间赣榆知县，他在任期间，居然因大沙河镇经济繁荣，州民多寄居，而上报申请给予赣榆县的特殊待遇，足见距今四百多年



以前的明代,大沙河镇已是商贾云集、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集镇了。这也许是“一条活龙福无穷”吧!然而,大沙河的多次改道,衍生出一些新的地名,积淀了厚重的地名文化,地名文化折射出厚重的历史,诉说着沧桑巨变。

二、大沙河的自然变迁与地名的衍生

根据有关记载和历代口碑资料得知,大沙河曾有四次改道。大沙河较早的河道,是从上游的石梁河东,原孟曹埠村西南向南经赤金村西、大沙河街西,转向东经刘庄北,至城子村北北下,成东北方向,经戚园、大口、刘圩、欧口东流入艾塘湖(墩尚与青口之间的一大湖泊),由艾塘湖向东流入大海。

第一次改道,由沙河街南直接东流成东西走向,途经渊头、彭口、竹园、小道口、大道口、孔园村北,入墩尚北艾塘湖。

第二次改道,大沙河由沙河街以东北下,至戚园村南向东流,经颜庄、老庄、下河口、渊子埃、何园、大潘庄等村,仍入墩尚北洼地(1976年尚存的颜庄河)。

第三次改道,清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大沙河由沙河街西蒋庄向东南方向流,经刘庄向东流,经城子,南庄、吴村、掘河等村南向东经小河口流入临洪河。

第四次改道,大沙河由东海县曹庄南流经前七里沟村、河上屯村又向东流,仍入临洪河。

经考证,大沙河从原来较早的河道发生四次改道,主要在赣榆的沙河镇、墩尚镇、罗阳镇及东海县部分地区。大沙河改道趋势是由东北方向逐渐转向东南方向偏移。大沙河经常泛滥,千百年来事实证明,淹南不淹北,因北部填高了,水向南流另改新河道。每次改道泥沙俱下,大水过后淤积成一片土地。有了土地,就不乏拓荒创业者,拓荒开发的人们根据需要,选择地形就地筑城建村,就自然形成与河相关的地名。还有的村落因河改道的影响,使本来的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也形成与大沙河有关的地名。如形成地名的通名中,一些带“口”的村名,带“埠”的村名,带“园”的村名,带“圩”的村名,带“堆”、带“沟”的村名等,从而,无形之中自然勾勒出一道道大沙河的旧河床。

如带“园”的村名有:赣榆县境内的戚园、高园、何园、竹园、孔园、卢园、洪园、侯园等,这些村分布于沙河镇以东,墩尚镇以西的地区,土地肥沃,便于灌溉,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基地。

如临河堆、渡口建村而得名的村有:赣榆县境内的前堆、后堆、穆堆、大道口、小道口、彭口、下河口、大口村、欧口、小河口。

如临河沟、池塘建村而得名的有:东海县境内的曹七里沟、前七里沟,河上屯,赣榆县境内的渊头原孟曹埠村旧址处于大沙河镇西北(现已淹没在石梁河水库内),位于石梁河东,此处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码头。《嘉庆赣榆县志》载:“在大沙河上流,上通游水,去治西南六十里。”据此证明,大沙河与古游水河相通,而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淮水于县(今江苏涟水县)枝分,北为游水,历朐县(今海州)与沐合,又经朐山西,山侧有朐县县城。……游水又北经东海利成县故城(今山东省临沭县利城村附近)东。……游水又北历羽山西。……游水又北经祝其县故城(今赣榆县班庄镇古城)西。……游水左经琅琊计斤县故城(今赣榆县塔山镇莒城村)之西。……游水又东北经赣榆县(今赣榆县海头镇盐仓城)北。……游水又东北经纪郟故城(今赣榆县柘汪镇驻地)南。……游水东北入海”。由此可知,古游水南通海州、淮水,北及六座著名古城入大海,在历史上曾是我国东部沿海南北内河航运的动脉。因为,原孟曹埠村旧址位于通古游水的大沙河中游处,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埠者码头也,无疑该地在历史上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货物集散码头,为商贾泊船交易之地,古盐仓城的盐及各地的货物通过商船运到此地,交易后运往各地,当时此地兴隆繁荣景象可想而知。约明末,孟姓借此定村名为孟曹埠。李曹埠村、刘曹埠村随孟曹埠取名。

位于原大沙河故道南岸的沙河镇的城子村,历史悠久,曾有出土的文物石斧、陶器等,证明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群定居。解放后,城子村群众挖渠翻土经常有建城用的古代砖瓦与军队作战用的三棱式铜制箭簇出土。历史考证,该村是东魏政权所设置的武陵郡和其所辖的洛要县治所旧址,这也揭示了古人临水建城而居的佐证。城址久圯,但城



子村却以此而得名。

历史变迁,沧海桑田。然而,大沙河改道所经过地域的村名,却没有随河之变迁而改变,而把原有的信息永远地定格在地名中,积淀成为厚重的地名文化,记载着大沙河变迁的历史而流传后世。

三、“导沭”工程与区划地名的变更

虽然,大沙河造化之功的确给人们带来万亩良田,为人类造福,但泛滥起来,却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害。旧县志记载:历史时期,因大沙河泛滥而发生比较大的水灾有十几次,每次都淹没大片农田,粮食颗粒无收,房屋被洪水冲塌,被淹地区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鬻儿卖女者不计其数。大沙河泛滥洪水凶猛时,甚至波及连云港市区,从而给该地的居民带来水灾。除水灾以外,旱、蝗等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因此,大沙河流域的老百姓总是忧旱愁涝,种地只能望天收。历代官府也整治过大沙河,《赣榆县志》记载,自清政府乾隆二十二年至民国时期几百年期间,据统计地方官府曾十治大沙河,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缺少统筹规划,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水利建设收效甚微。

多少年来,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的大沙河沿岸的人民,渴望早日根除水患,过上温饱安定的生活。然而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最终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政府对鲁南、苏北严重洪涝灾害非常关切,经多方论证,决定实施“导沭”工程,即在临沭县大官庄劈开沭河左岸的马陵山,将沭河部分洪水泄入沙河,利用大沙河排泄入海。将沭河上游改称总沭河,下游改称老沭河,大沙河改称新沭河,新沭河基本沿大沙河河床,在新沭河开挖中泓,筑堤束水,河道宽 1000 米。

“导沭”工程浩大、工期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于 1949 年 4 月 21 日,调集临沂、胶州、沂水、泰安、滕县、徐州六个专区,34 个县民工 114 万人次,技术工人 4500 余人,分十期施工,至 1953 年竣工。在工程实施中,几十万民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用血肉之躯向大自然开战。民工们住工棚,吃小米,用锹挖、镐刨、肩挑、车推,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水利工

地上,硬是挖出了一条横跨苏鲁两省,全长 80 公里,宽 1000 米的新沭河。从此滔滔沭河水按照人民的意愿,沿着新沭河(大沙河故道)东流经临洪口注入大海,大沙河之名也被新沭河所取代。

1953 年新沭河竣工,国家将赣榆和东海的行政区划做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决定赣榆、东海两县以新沭河为界,将新沭河以南的原属于赣榆县的黄川、浦南、青湖、石梁河、南辰等乡镇的垛金、埠上、石梁河、刘家乌、贾庄、土山庄、韩家湖、葛沟冲等共 112 个村划归东海县(包括民国 30 年、36 年两次划给东海县的村庄)。通过这次重大变革,上述的 112 个村从赣榆县的版图中消失。在开挖新沭河时,因赣榆县沙河镇张庄村原址在新沭河内,于 1950 年迁入现址(新沭河堤以东),村名仍为张庄村。

四、石梁河水库的建成与地名区划的变更

在新沭河工程竣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新沭河的灌溉和防洪能力,国家于 1958 年 12 月至 1960 年,投资 2575 万元,由徐州专署调集东海、赣榆两县人力在孟曹埠村西与石梁河之间建成石梁河水库,成为江苏省人工水库之最,总库容 5.85 亿立方米,泄洪闸最大行洪能力 4900 立方米/秒,赣榆、东海两县据此修建石梁河水库灌区。从此以后,灌区群众逐步开挖支渠,实现了自流灌溉,并从南方聘请稻农传授技术,大面积推广水稻种植。很快新沭河两岸的大地上稻花飘香,成为苏北的“小江南”,老百姓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这对以前祖祖辈辈靠种植旱作物生活的人们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然而,1958 年,因为修石梁河水库,赣榆县欢墩镇近三十个村将被淹在水库内,为了妥善安置淹没区的移民,赣榆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县移民办公室,专门负责移民工作。鉴于移民数量大,财力、物力缺乏,初以水库附近疏散为主,迁到外地为辅。1958-1959 年,被水库淹没区村民先后迁出。1958 年孟曹埠迁入大岭人民公社。1959 年马朱孟村、朱岔汪村迁入朱堵公社;曹埠店子村、东庄王塘村、中庄王塘村、西庄王塘村和陈圩子村迁入新海连市(今连云港市)锦屏公社;张朱孟村、徐朱孟村迁入



欢墩埠南岭；董家湾村、西沟屋村、于河村、王朱孟村、三角汪村、南朱果村、北朱果村迁入欢墩埠东岭；萌芽马疃村、高牙马疃村迁入坡石桥北岭；西马庄村、二龙村、安东村、安西村、孙朱孟村、李朱孟村、孟家岭村迁入净埠南岭。朱岔汪部分移民 1958 年迁入朱堵公社，1963 年划入门河公社，仍用原名。朱岔汪部分移民于 1958 年迁入朱堵公社，又于 1962 年划入殷庄公社，仍用原名。

1962 年，石梁河水库淹没山东省临沭县部分土地。1971 年经国务院批准，临沭县 8 个大队的 1466 户 6772 人划归赣榆县欢墩公社（现欢墩镇）。1971 年 7 月 20 日，赣榆县正式接收临沭县大兴公社北辰二大队 7 个生产队、蛟龙公社石门头二大队 4 个生产队，石门头三大队 5 个生产队、石门头四大队 3 个生产队、东窝子大队 8 个生产队、李小湾大队 2 个生产队、姚朱范大队 4 个生产队、东朱范大队 4 个生产队，从此这 8 个大队，37 个生产队，面积 4.5 平方公里，纳入赣榆版图。



石梁河水库泄洪图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了切实保证库区移民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不断提高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赣榆县人民政府又陆续对原来就近疏散或仍受水库影响的移民又作了重新安置。如：徐朱孟村于 1959 年由欢墩公社迁入城南公社，村名沿用原名；孟岭村于 1972 年由欢墩公社迁入罗阳公

社，至此仍用原名；董湾村于 1973 年由欢墩公社迁入罗阳公社，到此仍用原名；演马一村、演马二村、演马三村、演马四村于 1970 年由欢墩公社迁入墩尚公社，其中演马村居欢墩时，传说因战国时齐王在该庄后演马而得名“演马”，至此加序号称演马一，另三个演马村排序定名；董湾村部分移民于 1974 年由欢墩公社迁入门河公社，至此仍用原名；北朱果村，于 1965 年由欢墩公社迁入大岭公社，初为河南大队，1981 年更名为北朱果大队；三角汪村，于 1967 年由欢墩公社迁入殷庄公社，至此仍用原名。另外，还有原来不属于同一村欢墩公社移民，于 1975 年迁入城南公社，集中安置后，命名为城建村。

国家兴建石梁河水库，欢墩镇近三十个村在水库范围内，这些村的村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毅然迁出自己祖辈生活的家园，搬到政府安置的地方，为水库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党和政府除了都给予妥善安置外，并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

大沙河虽然给沿河人民造成数不清的灾难，但它毕竟功大于过，因为她也曾是一条哺育过沿河人民的母亲河！人们将永远记住她的历史功绩。如今，大沙河（今为新沭河）这条桀骜不驯的“活龙”，被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彻底“锁住”，河水泛滥使老百姓担惊受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几十年来，新沭河从没有发生过水患，特别是石梁河水库的建成，这条大河遇涝能排，逢旱能灌，早以成为一条为民造福的幸福河，真正实现了民谣所说的一条活龙福无穷。如今的新沭河流域的 620 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成为旱涝保收的高产田，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幸福祥和。

（作者单位：赣榆县民政局）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蜚声海内的徐氏医学世家

伏广喜

提起中国古代名医，人们不约而同地会说起扁鹊、张仲景、皇甫谧、华佗、钱乙、李时珍等耳熟能详的名字。你知道吗？古代连云港，也曾出过“国家级”名医，与上述名字一样，被众多的历史文献所记载。徐文伯和徐嗣伯，就是古代连云港“国家级”名医的杰出代表。

徐文伯、徐嗣伯是叔伯兄弟俩，生于动荡的南北朝时期。《南史》及本市的地方文献《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等对他俩都有专文记载。对于他们的籍贯，《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均写明为“东海人”。《南史》上也有“融（张融）与东海徐文伯、徐嗣伯兄弟厚”的肯定表述。关于东海这个地名，历史上有两个概念，即东海郡和南朝泰始7年（471年）正式“挂牌”成立的东海县。前者从西汉至唐宋年间，除了侨置镇江和丹徒那一段时间，其境域均以今日连云港为主体，可以说是古海州的前称。而后者即今日云台山周围地区。至于他们的先辈是哪一代来东海，后代又什么时候迁出东海，这另待考证。

与中国其他的古代名医不一样的，其他名医均为单一的个体，而他们兄弟俩却是一个医学世家，整整传了7代，出了12位载入史册的“国家级”名医。其中的徐道度、徐文伯、徐成伯、徐之才、徐之范等都曾进入宫廷为皇室诊病，有的进入太医署任职，被皇帝封了高官。

徐熙——徐氏医学的创始人

徐氏家族为徐偃王之后。这个徐偃王，西周、春秋时为徐戎（后为徐国）的首领，统辖今淮泗一带。《后汉书·东夷传》载“有地方500里”，向其朝贡的有36个国家。汉时徐氏宗族迁到浙江东阳。曾做过濮阳（今河南滑县、濮阳、范县、山东鄄城一带）太守的徐熙是这个医学家族的创始人。早年，徐熙对黄老之学感兴趣，尤

其是对道学颇有研究。曾跑到秦望山（今诸暨、绍兴交界的刻石山）当了隐士。让他专注于医学研究是一个偶然的機會。一天，一个道士路过他那里，向他讨一瓢水饮。尔后这个道士给他一个葫芦。徐熙打开这个葫芦，见有一部《扁鹊镜经》，便没日没夜地研读起来。不久，这个昔日痴情于道学的隐士一下成了名震华夏的名医。自此，开启了徐氏医学世家的传承历史。

徐秋夫——传闻可给鬼下针

徐熙之子徐秋夫，得徐熙真传，按照史书上说是“弥工其术”、“可通鬼神”。在他任射阳（今江苏淮安）令时，一天夜里，从远处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声。秋夫问道：“你是鬼吗？要干什么？”鬼回答说：“我姓斯，本是东阳人，因患腰疼病而死。现虽然成了鬼，但病痛依然在折磨着我，和没死的时候一样难受。人人都说你医术高明，给我治一下吧。”徐秋夫说：“你是鬼，我看不见也摸不着，叫我怎么治？”鬼说：“你用茅草扎一个草人，然后按照穴位扎针就是了。”徐秋夫依他所言，扎了一个草人，按照自己平时的治病方法，先在草人背部四个穴位用针，又在草人肩部三个穴位用针，然后祭祀一番，便把草人埋掉。第二天天一亮，便有人来向他谢恩，转眼便不见了。

这个活灵活现的传闻，不用说是迷信。但从一个侧面说明，徐秋夫的医术是非常精湛的，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非一般医师可比。在他所处的封建社会里，民间一步一步地对他加以神话，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另外，也可理解为是老百姓对他进行宣传和颂扬的另一种方式。

徐道度——被誉为“天下五绝”之一

徐秋夫生子徐道度、徐叔响。文献记载他俩“皆精其业”。其中徐道度，内外兼



修,无论是手术,还是把脉,都是一把硬手。因此,他所在的南朝宋,朝廷经常要他为宫室成员把脉抓药。由于他腿脚不便,当朝的宋文帝(424~453年)刘义隆特许他每次可“乘小舆(车或轿)入殿”。每次诊病,几乎是手到病除,“无不绝验”。宋文帝一次不无感慨地说:“天下五绝,你的医术为其一。”宋文帝所说的“五绝”另外“四绝”即当时善弹琴的杜道鞠、擅长诗文的范悦、善于书法的褚欣远、善于下围棋的褚胤。后来,宋文帝封徐道度为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太守。徐道度曾著有《疗脚弱杂方》,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治疗脚气病的专著。

徐道度的弟弟徐叔响医术也非常了不起。除为人疗病外,著有医学专注多部。如《脚弱方》8卷、《针灸要钞》1卷、《体疗杂病方》6卷、《解寒散方》6卷、《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本草病源合药要钞》5卷。可惜这些珍贵的专著均已佚失。

徐文伯——宫廷侍驾四十春秋

到了徐家第四代,出了徐文伯、徐嗣伯、徐成伯三位有成就的医林高手,将徐氏医学推向巅峰。

徐文伯,字德秀。是徐道度之子。史载他“倜傥不屈于公卿,耻以医为业。”故终身随侍帝王之侧,不以太医称之。他是徐氏医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很多医学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宫廷医学的重要典藏。

公元454年至460年间,宋孝武帝时的路太后患病,腹部巨痛,众医都束手无策。徐文伯诊断后说:“此石缚小肠(即为小肠结石病,应为今胆结石、泌尿系统结石之类疾病)耳。”他用“水剂消石汤”给路太后服用,路太后很快就康复了。这件事令孝武帝很高兴,任他为鄱阳(今江西波阳北)王常侍,还赏以千金为谢。宋明帝时(公元465—471年),一位宫女患腰疼病,发作时“腰痛牵心”、“辘气欲绝”。众医诊断为肉症(即肿块),几乎无药可治。而徐文伯诊断却说是“发瘕”。他建议“以(香)油投之”。宫女服用香油之后,吐出了一大团如毛发般的东西,将其扯散之后竟有3尺多长。在这之后,宫女的腰痛再也没有犯。徐文伯的针刺之术在宫里非常有名。有一天,宋后废帝(473~476)刘昱邀徐文伯出门游玩。路上,遇到一位孕妇,刘昱也善医道,在给孕妇诊察后,说该妇怀的是女孩。而徐文伯诊察后

则说“腹有一男一女,男居左,青黑,形小。”刘昱不相信,当场竟灭绝人性地要剖腹验证。徐文伯阻止说:“用刀太残忍,让我用针,胎自会脱落。”他在孕妇的足太阴穴下针,并用手摩挲阳明穴,孕妇很快产下一男一女。这是中医史上记载的最早的针灸引产术。

刘宋王朝覆灭后,徐文伯入仕南齐(480—502),被封为太守。其间,撰有《徐文伯药方》、《徐文伯疗妇人瘕》等专著,但均已不存。

徐嗣伯——疑难杂症独步天下

徐嗣伯,字德秀,是徐叔响的长子。据史载,他“善谈老庄之道,喜直言,曾任正员郎,诸府佐等职”。徐嗣伯与徐文伯一样,同样代表着徐氏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是诊治疑难杂症的高手。他虽然没有进入宫廷,但靠自己的勤奋和钻研,同样独步医林,名震江淮。南齐直阁将军房伯玉,有怕冷的毛病。当时比较流行炼丹服石。房伯玉就服用了五石散。所谓五石散就是用紫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白石英、硫磺等5种石药炮制的丹药。谁知,服用五石散后,房将军反而更加怕冷了。夏天都要穿一件夹袄。徐嗣伯诊断后说:“卿伏热,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11月,冰天雪地,徐嗣伯要房伯玉脱去衣服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取冷水从头上不停地往下浇,一直浇了上百桶,直浇得房伯玉昏厥过去。一旁的家人赶紧叫徐嗣伯停手。徐嗣伯说,要想将军的病好,你们就不要多管。接着又浇了上百桶水。这时,房伯玉的后背开始能动了,并直冒热气。再过一会,坐起来说热不可耐,并要吃冷东西。自此,他的怕冷毛病彻底治好,冬天,依然穿着单衣单裤。

一年春天,徐嗣伯路过南篱门,听见一茅屋有呻吟声。他进去看一下,见是一个老妇,自称全身上下都疼,到处都是黧黑的包块。徐嗣伯煮了一升多汤药,送去让她喝下。老妇喝完后,疼痛加剧,在床上打滚。不久,从她身上黧黑处拔出很多肉钉,长寸许。尔后用药膏涂堵疮口。三日后,老妇疼痛消除。徐嗣伯说,这种病叫疔疽。

徐嗣伯在多年的医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著有《落年方》3卷、《药方》5卷、《杂病论》3卷。



徐成伯——隔帷诊疾成佳话

徐成伯是徐叔响的另一个儿子，名馨。早年，他是一名民间医师。有一年在青州行医被北魏慕容白曜俘获。后被解送至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66—470）听说他医道高明，特意想考察一下。他令人将病人置于一块帷幕后面，然后让徐成伯给病人诊脉。徐成伯诊断过后，准确地说出病人的面色、症状、病情、病因。通过这一考察，献文帝对徐成伯的医术十分佩服，并大加赞赏。并将他留在皇宫。不久，授以中散令官职，后又升为内侍长。

献文帝驾崩，文明太后临朝听政。徐成伯曾与李修一起同为文明太后诊过病。

孝文帝（470—499）亲政，徐成伯又奉诏为他诊病，同时为他正得宠的冯昭仪诊病。太和 22 年（498 年），孝文帝出巡至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时患重病，急召徐成伯。徐成伯日夜行程数百里赶到孝文帝处。经过精心诊治，孝文帝的病痊愈了。这件事令孝文帝非常高兴，在举办筵席时特意安排徐成伯坐上席，并向文武百官讲述徐成伯用高超医术为自己治病的功绩。此外，赏赐厚礼，并授以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

徐成伯在为别人治病的同时，自己也非常注重养生，以致活到 80 岁时，鬓发还没有白，是徐氏名医中年事最高的一位。

徐之才——少年神童，成年郡王

徐氏第五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文伯之子徐雄，徐成伯之子徐践。他们的医术、名气都还不错，史上评价为“以医术为江左所称”。只是稍逊于他们的父辈。让徐家医术再创辉煌的是徐家第六代，即徐文伯之孙、徐雄之子徐之才和徐之范。

徐之才，字士茂，是徐雄第六子，人称徐六。生约建武 3 年（496 年），卒于北齐武平 6 年（575 年）。他自幼聪明绝顶，5 岁就能背诵《孝经》等书，13 岁就被招为太学生，当时被人们赞为神童。渐入成年后，以丰厚的经史、天文知识，尤其是高明的医术，为众多的地方官员所折服。他初仕南齐，后被北魏所俘。在北魏及后来的西魏、北齐等地，都被重

用。曾任兖州刺史、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职。武平二年（571 年），被封为西阳（今湖北黄冈附近地区）郡王，这恐是徐氏医学家族中官位最高的一位。

徐之才在北魏及后来的西魏、北齐等国侍奉过多个皇帝，可见他医术多么高明。北齐武成王高湛（561—564）因酒色过度，时常感到精神恍惚，说空中常出现五色的物体，接着又变成舞动的美人，之后又变成观音菩萨。徐之才用汤药给武成王治疗，病渐渐转好。过了一段时间，武成王这一病又复发了，宫人又骑快马召来徐之才。这次，徐之才将针灸与汤药并用，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病情趋于稳定。其后，徐之才被派到外地当差，不曾想武成帝的病又犯了。当把徐之才召回，早已不治身亡。有一个人患脚跟肿痛，很多医生都识不得这是什么病。徐之才诊断后说：“蛤精疾也。”原来，患者经常下海，脚长时间放入海水中倾入蛤精子（可能是海中一种叫波虫的小动物）。于是，徐之才果断下刀，从该患者足脚跟处剖处两枚蛤精子，大如榆荚。自此，该患者脚足痛消失。

徐之才被史书记载的主要医学著作有：《药对》2 卷、《小儿方》、《徐氏八代效验方》10 卷、《徐氏家秘方》、《雷公药对》等。现代中医宣、通、补、泻、涩、滑、燥、湿、轻、重之“十剂”，据说为他所创。

徐之才的弟弟徐之范，医学也相当高明。北齐武成帝时期，担任尚药典御。并承袭徐之才的西阳郡王职位。北齐灭亡后，徐之范供职于北周（公元 558—581），官至仪同大将军。

到徐家第七代，已进入隋代。徐家医学代表人物为徐之范之子徐敏斋。在当时国内医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隋开皇年间（公元 581—600），官至仪同大将军。然而，从徐敏斋之后，徐家医学虽然也有一定的传承，然医术平平，再也没有产生在国内能够叫得响的重量级人物。

（作者通联：新浦区郁洲南路 169 号景山秀水小区）

责任编辑 邱仕明



灌云县城伊尹像

商相伊尹传奇

黄正明

伊尹，又名伊挚，夏末莘国(今菏泽市曹县莘冢集大集乡殷庙村)人，是商朝初期著名的丞相。

因为他的出生地在东夷范围之内，又曾在灌云县伊芦山隐居过，现在的灌云县城还树立了高约6米的伊尹全身塑像，说明他的美德和崇高形象仍深受灌云人民尊崇和怀念。特撰此文，求教于方家。

出生空桑 少小为奴

《皇甫谧》云：“伊尹，力牧之后，生於空桑。”《吕氏春秋》云：“有莘氏女采桑，得婴儿于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记述有一位莘国的女子采桑时，在一棵大桑树的树洞里拾到一个男婴，抱回去献给了国君，国君把婴儿交给他的厨师抚养，以水命名，曰伊尹。随后怕有人追查婴儿的来历，就出现一个传说故事。说伊尹的妈妈住在伊水河边，一日梦见一位天神告诉她，如果要看到她家舂米的石臼向外冒水，就千万别回来，一直不停地向东跑。第三天果见石臼向外冒水，于是她就拼命地向东跑，一口气跑了十余里，不禁好奇地回头望一望，这时她住的村子已变成了一片汪洋，而洪水还汹涌地向她冲来，伊尹的母亲大喊一声，霎时变成了一棵枯死的老桑树，大水随之退去。伊尹生在桑树地一棵大桑树洞中，被莘国采桑女发现抱回。

伊尹的一生很坎坷。很小的时候就成了莘国的奴隶，受尽了打骂欺凌。伊尹长大成人后，长相奇特，天资聪明，有志气，有抱负，刻苦学习，做任何事情都比较用心，学了一手高超的厨艺。有莘国的国

君对饭食的质量要求很高，厨师都是国君亲自挑选的。一次，有外宾来访，厨师因故未能及时准备午餐，大家都惊惶失措。情急之下，他们想到了伊尹，伊尹没有推辞，干净利落地准备了一顿丰盛新颖的午餐。席间，宾客对饭菜的色香味大加赞赏。有莘国的国君也非常满意。从此，国君便专门让伊尹为往来宾客准备饭菜。在与宾客的多次接触交谈中，伊尹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一些国内外大事。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若不摆脱奴隶的生活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于是，他更加刻苦地积累知识，更加虚心地向有学问的人求教，终于成了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

薛国国君钟虺在访问有莘国时与伊尹一见如故，他非常赏识伊尹的才学，决定把伊尹请到薛国委以重任。有莘国的国君是个很自私的人，他坚决拒绝了钟虺的请求。钟虺无奈，只得忍痛与伊尹拱手而别，临行前拿出一笔钱将伊尹赎为自由人。

成汤爱才 重用伊尹

与此同时，夏王桀荒淫暴虐，民怨很大；侵害诸侯，诸侯怨恨；他自比太阳，话比天大。《竹书纪年》云：“后桀代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而弃元妃于洛，曰未喜。”挥霍钱财，大兴土木，整天花天酒地，致使民力衰竭，夏朝败落。《史记》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民再也无法忍受，深恶痛绝地诅咒桀。《尚书·汤誓》载有“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各地诸侯也纷纷叛离，尤其是东方一些方国渐次弃夏附商。夏桀忠臣关龙逢对夏桀不理朝政忧心如焚，直谏之，被夏桀以蛊惑人心的罪名斩首。

一天，钟虺对成汤说：“当今天下，夏国势力仍



是最强,然而夏桀贪财好色,对百姓横征暴敛,早已失去民心,他的身边尽是些不学无术的小人,一些有为之人纷纷离他而去。商国若想取而代之,非一人不可。”成汤一听忙问此是何人。钟虺说:“此人虽有才学,但出身寒微,不知大王是否肯接受。”成汤原本非常爱才,急切地说:“只要能助我兴国,无论是何出身,我一并重用。”钟虺便向他详细介绍了伊尹。成汤一听大喜,忙命使者去有莘国聘请伊尹。

谁知使者对有莘国国君说明来意后,有莘国君面露愠色,他不理解一个奴隶能有什么本事,会使别国几次三番打他的主意。既然在本国他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也不能让他到别国发挥作用,以免将来与我作对。于是不软不硬地拒绝了使者。同时,又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伊尹再次贬为奴隶。

成汤对有莘国的无礼行为非常气愤,准备出兵讨伐。钟虺忙劝阻说:“目前我们不能树敌,既然派使者不行,我们可以用联姻的方式。有莘国君的女儿尚未婚配,年龄与世子相仿。若有莘国君同意联姻,再以伊尹为陪嫁,此事不就解决了吗?”成汤听罢觉得有理,便再次派使者出使有莘国。有莘国君胸无大志,又国力弱小,一听说商国主动提出联姻,更是喜不自禁。认为既然两国通婚,那么伊尹到了商国也不会与有莘国不利,所以将一切条件答应下来。伊尹顺利地到了商国。《史记·殷本纪》中说:“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反复请五次(有说三请),伊尹才得以去辅佐商汤。他对汤陈说王道,深得汤的信任,被破格重用。

夏桀衰亡 汤建商朝

夏桀此时虽然民心尽失,但名义上还是各国的首领。他见商国一天天强大,心中有些害怕。又见成汤曾为关龙逢被斩首举行过祭祀,很恼火,想要除掉成汤。于是假意对成汤发出邀请。

成汤一到夏国,便被夏桀囚禁。商国大臣顿时乱作一团,并埋怨伊尹不该瞎出主意。伊尹并不惊慌,他说:“夏桀贪财好色,只要给他送去财物美女,大王一定平安归来。”夏桀见到财物美女,果然喜上眉梢,忙命人放回成汤。

汤见夏桀成了暴君,夏民痛恨万分,怨声载道,

国家日趋衰败,深为不安,决定推荐伊尹给夏桀,重整朝纲,劝说桀改恶从善。夏桀见到伊尹,根本不予理睬,更说不上重用。伊尹在夏期间,仔细考察了夏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地理情况,又用珍宝、美女收买了夏桀的一批宠臣,并结交了被夏桀丢弃的元妃末喜,获得夏国朝廷的内部情况。商汤见夏桀不重用伊尹,就请伊尹重回亳邑,正式拜为右相,授予国政。伊尹便辅佐商汤大力发展农耕、训练军队、铸造兵器,使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繁荣昌盛起来。同时,采取剪除夏羽翼,寻机灭夏的战略。首先是扩充实力,争取附近的小国离夏附商,又灭掉葛国等敌对的几个小国,进一步扩大了汤的势力。夏桀对成汤扩大地盘的行动有所察觉,但见贡赋较从前有增无减,也就放下心来,放松了警惕,继续与近臣、宠妃一起吃喝玩乐。

几年之后,成汤的势力远远超过夏国。伊尹见时机成熟,建议进攻夏朝。但要把夏朝推翻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夏朝已延续四百多年,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子继父位的传统思想。经过伊尹和汤一商量,决定召集商军将士大会,由汤亲自向大家誓师演讲。汤说:“我不是敢进行叛乱,实在是夏桀作恶多端,上帝的旨意要我消灭他。我不敢不从天命啊!”接着,他又宣布了赏罚的纪律。此时的将士也恨不得夏桀早日灭亡。因此,上下一致,决心与夏桀作战。伊尹建议成汤对夏国停止贡赋。夏桀得知大怒,派兵攻打成汤,未料大败而归。夏桀重新组织兵马,在鸣条与成汤展开了一场大血战。商军训练有素,个个杀敌勇敢,势不可挡。而夏军荒于操练,兵将都不愿卖命,军队失去了战斗力,作战不久便溃不成军。夏桀见大势已去,带着几个侍从慌忙逃走。在半路上被成汤捉回,软禁在南巢。三年后,夏桀忧郁而死。(《尚书》和《史记》有详载。)

伊尹作训 建立法纪

成汤登上商朝的王位后,伊尹和钟虺继续为左相和右相。伊尹被汤尊为阿衡。

成汤死后,伊尹仍尽心尽职地继续扶佐诸位继位的新帝。《史记》云:“旁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俎后,”制定了一系列法纪法规。教育太甲怎样做个贤德的君王,如何分辨是非,如何治理国



家。又给太甲讲成汤的法律制度,教育太甲按祖宗的规矩办事,还给太甲讲历史上贤君的故事。太甲起初还能听从,时间久了,就有些忘乎所以,一意孤行。《史记》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伊尹多次规劝,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于是,伊尹以国家利益为重,便决定把太甲送到汤墓附近的桐宫,让其问心细想自己的行为,一切国政暂由伊尹办理。太甲住在桐宫,以前那些享用和游乐都没有了,自己不再是威福自恣的商朝帝王,连行动都不自由。他回想做国王时何等荣华富贵,何等快乐与威仪,现在弄到这般境地,不觉悲从中来,又愧又悔。暗想当初若听从伊丞相的话,好好勤政节俭、守法爱民多好,如今后悔莫及,只有自悲自叹。《史记》云:“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就是说伊尹知道太甲确实变好了,便亲自携带商王的冠冕衣服,到桐宫迎接太甲返回商都,再登王位。太甲接受了上次教训,勤政修德,体察民情,按章办事,把商朝治理得逐渐繁荣昌盛起来。各诸侯心悦诚服,均来朝拜。老百姓也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伊尹又写《太甲》三篇,褒赞太甲帝施行德政,尊称太甲帝为太宗。

为了长治久安,他又写了《伊训》等多篇关于执政治国的论文,使各继位商王有章可循,重视以德治政。因此,商王朝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约六百年之久。直至纣王背德政,拒谏饰非,才导致商朝灭亡。

伊尹在商初的经济建设方面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使我国奴隶社会得到很大发展。他主持规划建造了商都,规范统一了甲骨文,发展中医中药,发展丝织业、烹饪业,还兴修水利。伊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善于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上说:“伊尹……异道而同工。”可以看出伊尹高超的领导和指挥才能。

隐居伊芦 以防不测

相传伊尹曾隐居灌云东部一个山岛上时,用芦苇搭建简易茅舍居住,自己扮成普通山民,以避外人生疑。此山便被称作伊芦山。他身在伊芦山,还惦念着国家大事,惦念着家中子孙,就经常站在山峰

高处向西眺望。然而,汤都和家乡是望不见的,只望见西边有两座山。于是,大于伊芦山的就叫做大伊山,小于伊芦山的就叫小伊山。小伊山北边有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不知是什么时候修成的,也被命名为小伊河。

伊尹为什么要隐居伊芦山呢?是什么时候来伊芦山隐居的?原来是太甲帝从桐宫回亳重新执政后,伊尹已到了年老退休之时。此时,伊尹有两怕。一怕太甲帝不能彻底悔过自新,今后仍会像以前那样乱德暴政,毁掉商朝江山,便写了《太甲》三篇,明是赞扬太甲帝“修德”,实是再三强调以德治国的道理,希望太甲帝及今后诸位接任者一定要以德治国。二怕太甲帝对他的态度有反复,顾虑有朝一日以“放之桐宫”施以报复。伊尹便在告老还乡后,离开都城豪华相府,远离家乡,远离太甲帝,到天涯海角去隐蔽一段时间。于是,就东行千里,来到东海边当时还在海中的一个海岛上隐居。这也可能就是伊尹在伊芦山隐居的“隐情”吧。这里的人们认为他为国为已都属于“善后之举”,便将伊芦山北边的一条大河起名为“善后河”,以资纪念。

一代贤相 千古流芳

伊尹从奴隶到丞相,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四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和肯定。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歌颂伊尹为大贤阿衡。千年来作为启蒙教材之一的《千字文》中亦有“磻溪伊尹,佐时阿衡”的赞颂语句,要学子背诵。

如今,我们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伊尹,仍应当对他予以肯定。首先是肯定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社会起推动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其次是肯定他对人民有利,而不是有害。辅佐成汤推翻荒淫暴虐的夏桀王朝,有利于减轻当时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他对商王朝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费尽心机,尽职尽责,功不可没。可以说,伊尹是我国商朝的一位著名的主张德政治国的丞相,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思想家、军事家。

(作者单位:灌云杨集文化站)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水利专家武同举与《江苏水利全书》

陈 炜



武同举与《江苏水利全书》

武同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一生致力于水利事业，为我国水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武同举水利著作甚多，他的水利著作，广征博引，材料极为丰富。由于年代久远，能够收藏到的著作尤为少见。笔者收藏的地方文献中有一套武同举的著作《江苏水利全书》，时隔 60 余年，该书显得尤为珍贵。

笔者收藏的这套《江苏水利全书》共三册，1944 年 12 月由南京水利实验处印刷发行。该书纵 26 厘米，横 18.5 厘米，竖排右开本，繁体字印刷。封面右上方印有灌云

武同举两轩编纂，中间为曾任江苏省长韩国钧所题书名《江苏水利全书》字样，左下方印有南京水利实验处印行字样。该书内容有：代序、韩序、弁言、目录、弁图、第一编江、第二编淮等共七编组成。

武同举(1871-1944)，字霞峰，别号两轩、一尘，我市南城镇人。清光绪年间，他先后考中秀才、举人、拔贡，清末任海州直隶州通判。民国建立后，武同举曾任《江苏水利协会杂志》主编、国民政府江苏水利署主任，兼海工科大学水利史教授，江苏建设厅第二科科长、“视察”等职。

1915 年前后武同举担任海州第八师范(在板浦)和清江浦第六师范的国文教员。他虽做国文教员，但眼见苏北水灾严重，心里很是着急，日夜焦思，写就《吁兴江北水利文》，并附《水利图说》，呼吁当权者务必要兴修苏北水利，1918 年离开学校到驻扬州的江苏水利协会，担任该会杂志主编，从此走上四十年与水利事业打交道的人生之路。

1924 年，武同举受江苏省长韩国钧的聘请，出任江苏省长公署水利署主任，主管全省水利工作，还先后兼任过南京海工科大学水利学课程。武同举一生致力水利事业，曾参加连云港海港的勘察工作，发表了大量的水利著作。主要有：《淮系年表全编》、《再续行水金鉴》(与赵世暹合著)、《江苏水利全书》、《江北行水今昔观》、《会勘江北运河日记》、《测绘海州港口导记》等，堪称我国最早研究沂、沭、泗水利问题的专家。他所编著的《淮系年表》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治淮工程中乃至今后仍起到重要作用。

民国 25 年，《江苏省政建设月刊》刊载了他的《淮史述要》论著。是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组织和水利学家郑肇经主持下，武同举与赵世暹编辑了《再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的内容主要包括长江、淮河、黄河、运河、永定河干支流和与之相通的重要湖泊，以及海河、珠江、辽河等的自然情况和治理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该书成为小浪底水库和长江三峡工程的重要设计依据。可见武同举参与编辑的这份历史遗产对于研究今天的治河问题，了解江河变迁规律和制定防洪规划，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国 28 年武同举迁居上海，专心于《江苏通志·水工志稿》的写作。民国 29 年，辛苦十多年发奋编纂的《江苏水利全书》完成，该书原名《私纂江苏通志水工稿》，附江苏省建设厅民国 23 年《江苏水道图》，共 7 篇 43 卷，150 万字。该书记载了自公元前 2286 年至民国 26 年，上下四千年的长江、淮河、运河、太湖水利，江南海塘里下河及盐垦区水利，淮北沂沭泗流域水利，堪称华东水利资料之宝库，为江苏水利史上难得的一部水利全书。

(作者单位：连云港日报社)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朱瑞在西朱范

王晓华

朱瑞(1905—1948),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人民炮兵的奠基人,1905年9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埠子镇龙河乡朱大兴庄。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中,不幸触雷壮烈牺牲,星殒辽西大地,时年43岁。他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

朱瑞1939年6月入鲁,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同赴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先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1942年3月29日,朱瑞随八路军115师师部由刘福村转移至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原属山东省临沭县管辖),并在此战斗、工作、生活长达数月之久。在西朱范村期间,朱瑞以他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事必躬亲的工作态度、高超果敢的指挥艺术、勇于自我批评的博大心胸,与罗荣桓等领导同志一起,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军队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胸襟坦荡自我批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42年是山东敌后斗争最为艰苦的一年。为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目,日本大本营调整军事部署和策略,强化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许多地方由原来的解放区变为游击区、敌占区,战略区之间被严重分割、封锁和包围,难以相互联系和策应。同时,由于纵队、115师、山东分局各领导人之间在军事斗争、思想教育、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造成在军事指挥上缺乏统一、群众基础缺乏根基、敌友我三方面情况缺乏深入调查和研究,对敌后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

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应付斗争环境的办法。这些主客观因素,致使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几近陷入被聚而歼之的危险境地。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受中央委托,在回延安参加“七大”途经山东时,代

表中央视察指导山东工作。四月上旬,刘少奇同志到达山东分局、115师师部所在地东海县西朱范村。一安顿下来,刘少奇立即找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委员罗荣桓、陈光、黎玉个别谈话。

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座谈、调研、酝酿之后,1942年4月16日,刘少奇召开了一次肩负着解决山东当前和今后的全局性战略问题的关键会议——山东分局委员(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同志在肯定山东这几年工作成绩的同时,重点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并对错误、缺点的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最后,刘少奇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这些问题的产生,作为分局书记的朱瑞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对于刘少奇同志的严厉批评,朱瑞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衷心拥护、接受并及时改正错误。

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分局负责同志连



东北军区炮兵司令朱瑞



续举行会议,彼此思想见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首先作了认真深刻的自我检查。之后,他还与其他负责同志开诚布公交换了意见,检查自己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虚心诚恳地接受大家的对自己的批评,并对分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朱瑞严于解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的高风亮节,受到大家广泛地钦佩和赞赏,刘少奇同志也给予朱瑞很高的评价。

深入基层开展“双减”

在刘少奇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朱瑞和山东分局通过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讨论确定了今后山东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决定以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为中心,从根本上改善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朱瑞认为,应该把中央提出的“双减”政策,作为当前山东分局的工作重点并加以即时有效开展执行起来。1942年4月25日,在西朱范村的大花园里,山东分局召开由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应山东分局邀请,刘少奇同志向大会作了关于全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报告。报告中对山东分局如何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做了全面的具体的指示。刘少奇同志的这次报告,对山东地区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作用。

会后,朱瑞亲自主持有关政策的起草工作,并于1942年5月4日召开分局会议,先后通过《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和《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补充指示》。

决定发出后,分局立即从党政军民各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对外用农救会名义),分别前往临沭、莒南两个党组织比较健全的县、群众基础比较好的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个外围村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的试点工作。朱瑞任试点工作总指挥。

在试点工作中,朱瑞遵照分局提出的“要求各级党的领导者,应尽可能参加实际工作,以密切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从这一工作中创造经验,积累经验,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工作精神,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亲自到西朱范村蹲点,深入群众家庭,了解具体情况。有时因忙于开会或工作离不开时,他也要派秘书下去,以便及时掌握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试点初期,有些工作组的同志放不下架子,缺乏与基层群众沟通与交流的技巧,甚至存在畏难情绪,工作进展不顺利。朱瑞知道后,就亲自跑到这些中心区、中心村,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鼓舞他们的斗志。要求他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脱掉军装,穿上农民的衣服,男同志要剃掉“洋头”,一律留光头,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女同志要扎裤腿,梳小髻,住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同志在朱瑞的教育下,纷纷解开了思想包袱,放开了手脚,为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到6月中旬,“双减”试点工作结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数万无粮、缺粮的农民得到了救济,雇工增资一倍以上;广大佃农实现了盼望多年的二五减租和一定三年至五年的租佃权,并使部分大佃户的土地转移到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手里,从而团结、组织了近千名的雇工和数千名的农民积极分子。6月下旬,朱瑞代表山东分局作了《滨海区农民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的报告,系统总结了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山东各根据地全面开展双减增资运动指明了方向,得到了刘少奇同志的充分肯定。随后,分局抽调一千多名脱产干部分赴全省各地,全面指导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这一切,为扭转山东敌后斗争的形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编抗协与抗敌自卫军

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和抗敌自卫军是在朱瑞的支持和山东分局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

1939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的部分高中级知识分子及国民党进步分子,因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要求抗日,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排斥,遂断然与之决裂,来到我根据地。这些同志到来后,在朱瑞和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于1939年7月1日(一说为7月7日,参见孙作民主编的《山东通史》),以李澄之、梁竹航、范明枢、彭畏



三等人为首,发起成立了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并经中共山东分局公开对外宣告。1940年2月,在我党组织的帮助下,调人抽枪为抗协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即鲁南国民抗敌自卫军。为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力量,1940年夏,朱瑞又对抗协、自卫军提出了“要组织、要群众、要武装”的“三要”口号,要求大力发展抗协组织,尽量吸收国民党进步分子,大力发展自卫军武装力量,从而使抗协和自卫军迈向一个新阶段。

初始,抗协和抗敌自卫军在山东分局的领导下尚能执行中共关于团结广大军民、普遍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张和政策,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战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更由于抗协主要领导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工作领导能力,致使该组织渐渐失控,特别是其基层,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基层组织还有反动地主、富农甚至汉奸渗透进来。他们鼓吹走第三条道路,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根据地兴风作浪,与我党分庭抗礼,争权夺利,个别被敌顽所利用,成为藏匿在我根据地的投敌变节分子,造成了内部的极大混乱。

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包括罗荣桓在内的各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要求加强对抗协和抗敌自卫军的领导和整顿。但由于朱瑞未能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致使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成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来到山东后,通过深入细致地了解,敏锐意识到:朱瑞领导下的整个山东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思想意识上缺乏深度,在实际贯彻运用中缺少灵活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作局面的被动,这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在山东分局委员(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严肃指出:“……在今天的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正面临着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其中之一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和掌握统一战线中的独立领导权的问题,这是关系到革命能否最终胜利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既析理深刻,高屋建瓴,又

春风化雨,温恭自虚,给朱瑞以极大的震撼和触动。他是一位知错必改,有错必纠,襟怀坦白的革命家,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后,充分利用会议间隙,主动来到刘少奇同志的住处,就山东根据地抗协与抗敌自卫军的问题与刘少奇同志进行了两次长谈。刘少奇同志站在现实和历史的高度,坦诚相见,虚心地对朱瑞畅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了朱瑞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和缺点,使朱瑞获益匪浅,在思想意识上有了一个重大转变。

扩大会议会后,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朱瑞、罗荣桓等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连续几次找到抗协和抗敌自卫军的负责同志谈话,进行说服解释,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为改编抗协与抗敌自卫军架桥铺路,奠定思想基础。

抗协是一个有党有军有政权的组织,一定程度上实行高度自治。起初,部分抗协和抗敌自卫军负责同志不愿意服从改编,仍想走第三条路。

针对这些人的反动本质,朱瑞严肃向他们指出:抗协“是在同情与依靠共产党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与发展”,现在抗协“强调第三党与中间立场的倾向,是与其宗旨相违背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对政权工作不是参加的,而是分肥,不是充实,而是瓦解,如果继续下去,是会有极大危险的。”对一些不思悔改的顽固投降分子,朱瑞和山东分局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给予严惩,极大震慑了一批心存不轨、别有企图的立场摇晃派,为顺利改编抗协和抗敌自卫军铺平了道路。

1942年6月18日,抗敌自卫军主要部分编入八路军,各地数量较小的自卫军,就地编入地方武装。7月13日,抗协山东省会部指示各级会部“改变抗协的半政党性质为广泛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年下半年,抗协解散,抗协成员分别分配到我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文教财经等部门工作。到1942年底,抗协成员和全部自卫军已完成改编任务,抗协成员绝大多数先后加入共产党。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来自抗协的干部为山东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东海县南辰乡政府)

责任编辑 张伟敏



编者按：

柏广恩，1909年9月出生于山东沂南。1940年正式参加八路军，1947年，参加中共华东局组织的公安人员整训后，随部队相继解放了潍县、兖州。不久又南下接收连云港，先后任公安边防局长、港务局副局长。1949年2月，柏广恩在连云港亲身经历了接收国民党黄安舰的全过程。解放后，柏广恩同志长期在连云港港口工作，为港口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值连云港开港80周年之际，本期特推出他的女儿柏建芳的回忆文章《我的父亲柏广恩》。

我的父亲柏广恩

柏建芳



2004年4月，柏广恩与老伴合影

投身洪流 杀敌报国

我的父亲柏广恩 1909年出生于山东沂蒙山一

个叫石拉子的小山村，他从小聪慧好学。读私塾时，父亲受临沂地区进步思想影响，随教书先生毅然剪掉象征封建王权的大辫子，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当时山东土匪横行，从1938年起，父亲就积极参加村里自发的抵抗土匪、保护家园的活动。石拉子村的百姓至今忘不了，一次土匪进村抢馍馍店，全村老少都逃到南山上躲藏，忽然听到村里喊杀声、自制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村头喊“快截住！打！”村后喊“快跟上来！别叫土匪跑了！”很快村里就平静下来，土匪被打跑了！是哪里来的队伍？人们怀着疑惑的心情回到村里查看。后来才知道，是父亲一个人借助熟悉的地形，利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在村里来回奔跑，机智地打退了土匪。

父亲的表现很快被党组织发现并积极引导，八路军、县大队经常在我们家开会。1940年，在王新元（解放后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管元洪同志的引领下，父亲正式参加了八路军，踏上了闪光的革命征



途。

和所有在烽火年代有作为的沂蒙儿女一样,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中,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由他编导谱曲的打汪沟街战斗歌谣在临沂上艾崮一带流传至今;他只身闯入敌营、搞策反、端鬼子碉堡,赢得了孤胆英雄的称号;父亲虽不是显赫领导,却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老百姓心目中优秀的八路军干部。

扎根敌后 机智锄奸

抗战期间,父亲在鲁中军区政治部锄奸科工作。父亲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在党组织锁定了那些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对象后,由父亲摸清案情、具体制定执行方案。

有一次,为了除掉一个汉奸,父亲化装成穿长衫、戴礼帽的绅士搜寻多天,终于在集市上发现了目标。他悄悄靠近汉奸身后,用手枪猛地顶住他的后腰。汉奸一看情况不好,立刻准备喊人,父亲没等他叫出声就果断将其击毙,接着朝天放了两枪,趁集市大乱之时全身而退。

1942年,因工作需要,军区司令部决定争取一个宪兵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父亲。临走时,组织找父亲谈话,“这次去他家,你估计他会不会杀你?”父亲很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会见机行事,况且论辈份他还是我表叔。”

当晚,父亲和王新元同志来到宪兵队长住处,父亲让王新元等在门外,自己独自进屋找人。谁知情况突变,原来军区司令部争取这个宪兵队长的事,地区领导并不知情,还派了另外的同志去家里逮捕他,只是因为他碰巧去了鬼子据点,才扑了个空。等宪兵队长回来,家人马上告诉他有人要抓他。恰巧这时父亲推进门来,这个宪兵队长理所当然地认为父亲就是来逮捕他的,二话没说,一把抓住父亲的胸口,举起枪对着房门就是一枪,把门打了一个洞!父亲刚要解释,忽然听到屋外又来了一群鬼子!父亲心想,坏了!就简单讲明了来意,并用个人生命担保,八路军决不是来抓他的。万幸的是,这个宪兵队长没有出卖父亲,而是把他藏在了里屋,并骗走了鬼子。父亲接着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用党的政策攻心,说得他一家泪流满面。父亲临走时保证,“只要你以后不帮鬼子做坏

事、多配合八路军,我们绝不伤害你!”后来,这个宪兵队长果然帮助八路军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时期,锄奸队的同志经常在我们家开会。每到开会时,母亲就端着针线筐去村口,假装捻麻绳、纳鞋底,替父亲他们放哨。有一次母亲在村口发现鬼子来了,赶紧跑回来,叫同志们分散躲到高粱地里,避免了损失。

当地的老百姓对锄奸队非常拥护。有一回,石拉子村有个叫贺赵的媳妇回娘家,在娘家听说国民党夜里要来石拉子村抓我父亲,就以到河边洗衣裳为借口,跑回来叫我父亲赶快转移。夜里国民党果然来抓人,但扑了个空。

独自率民兵打败一个营

1945年,父亲随部队驻扎在上艾崮村的八路军兵站(现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有一天接到军区命令:十三个县的领导将在青驼寺(现位于沂南县青驼镇)开会,要部队立刻去做保卫工作。部队开拔前,领导征求父亲意见,问他是否能留下。父亲坚决表示要留下,因为上艾崮村的党组织是他负责组建的,为了乡亲们安全,他必须坚守在这里。那时根据地情况险恶,八路军和日伪顽敌人形成拉锯战,八路军大部队一走,国民党顽固派一定会回来报复。部队领导对父亲说:“原来说好临过年要打下敌人三个据点,让群众过个好年。但这次有任务要暂时离开,我们就把打敌人第一个据点时缴获的一小束手榴弹留给你吧。”父亲说:“好!有这些手榴弹,我就一定扛得住!”

部队走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顽固派纠集了一个营的兵力,500多人扑向上艾崮村。发现敌情后,放哨的民兵立即发出信号。因为准备充分,父亲果断组织民兵护送乡亲们到安全地带,自己则带领十几名民兵骨干进入各个哨位,投入战斗。敌顽军摸黑集结在村外,用机枪、步枪、小炮一齐向村里开火,子弹、炮弹暴风雨般袭来。在父亲的指挥下,抗日民兵队队员个个义愤填膺,用土炮、土枪、步枪、土雷向敌人猛烈还击,很快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在敌人组织第二次进攻前,父亲调整了兵力,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敌人巧妙周旋。他们采取分点射击投弹的方式,让敌人找不到目标,摸不清方向,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会付出惨重的伤亡。又一次打退敌人后,为



避免给乡亲们造成更大损失,父亲紧急派遣民兵袁兆阳同志去联系县抗日民兵大队前来增援。

穷凶极恶的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了很多民房,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四起。父亲率领民兵和敌人在村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打到后半夜,有个叫袁均章的民兵不幸被敌人抓住,捆在一边,他拚命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在手榴弹烟幕的掩护下冒险救下了他,但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了。父亲把他安顿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安慰他不要喊也不要动。面对冲上来的敌人,父亲又继续和敌人拚杀。可袁均章同志由于眼睛看不见,不久又被敌人抓去,壮烈牺牲。

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父亲组织民兵利用一个油坊作掩体,向不同方向涌过来的敌人射击、扔手榴弹。到天快亮时,弹药全打光了,只听得围上来的敌人疯狂叫嚣“抓八路!抓活的!”这时,父亲发现墙头外有一口井,就对随身的民兵说:“跳井!不能被敌人抓住,说不定还能脱险!”民兵跳下井后,父亲也纵身一跃而下。井水有近一人深,父亲想,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一头钻到水里淹死,决不当俘虏,如没发现就露出头来呼吸。幸好井旁有棵小茶树掩护,敌人乱放了一阵枪也没找到人。看看天要亮了,不敢久留,就撤走了。父亲从井里出来,安全脱险。

大部队回来后,听说了激战的经过,非常震惊,也非常高兴。部队领导告诉父亲,那天晚上他们明知敌人来了,但部队不能回援,怕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父亲说:“没什么,以保卫军区会议为重,多亏了那些手榴弹!”部队将上艾崮战斗的情况上报了鲁中军区,司令部专门召开表彰会,还奖励了父亲一支手枪。这支枪父亲一直随身携带,直到“三反五反”运动前才上缴。当年救父亲脱险的那口井也出了名,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出差路过,都专程绕道去参观。

南下连云港 接收黄安舰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1948年秋,父亲随部队向济南进军,投入到“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中。但当部队行进到兖州时,接到上级命令:南下参加接管连云港的工作。1948年11月7

日,连云港地区已经解放,但进驻连云港的解放军主力部队——淮海军分区独立旅在连只停留了一天两夜,就接到撤出的命令,火速西返淮、涟、泗一线布防,阻击有可能突围南窜的黄伯韬兵团,连云港地区的防务就移交给了山东滨海军区。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军进驻连云港。当时父亲所在的部队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保卫局连云港分局,父亲任调研股股长。

解放初期的连云港匪特猖獗,社会治安混乱,父亲当时的秘密任务就是侦察港务局内部及社会上的敌情。由于那时通讯条件差,幸亏边防检查站楼顶养了许多信鸽,便于随时送信联络。

1949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我父亲亲身经历了接收黄安舰的全过程。黄安舰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作为战争赔偿从原日本海军中接收的34艘军舰之一,在日本海军中原名为“海防81”号,1945年刚刚下水不久,日本就战败投降了。中国政府接收时依接舰顺序编号,称其为“接22”号,编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后,正式命名黄安舰。黄安舰是一艘护航驱逐舰,吨位虽不大,但火力猛、航速快,是国民党海防第一舰队的主力。解放战争中,黄安舰官兵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海军官员贪污腐败、排斥异己、利用内战中饱私囊的行径,对国民党当局越发失望和不满。在我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黄安舰部分官兵终于在1949年的元宵节成功举行起义。进步官兵们在控制了全舰后,骗过美国第七舰队,顺利驶出青岛港。黄安舰起义,在当时属于最高机密,只有军队高级首长知晓,加上连云港地区的驻军刚刚完成换防,指令还没来得及下达,基层官兵对此事一无所知,因此上演了解放军“鸣炮”迎接黄安舰的惊险一幕。

1949年2月13日凌晨四时许,黄安舰驶抵连云港海域,舰上官兵按照事先约定,打开全舰灯光,准备联络。父亲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他和胡怀民(当时港务局人事科办事员)在连云港火车站二楼值班。大约凌晨三四点钟光景,胡怀民突然扳着父亲的脖子大喊:“快起来!敌人的兵舰打进来了!”父亲一下子睡意全无,跑到窗口一看,东北边海面上果然有一艘军舰,还亮着灯!当时解放军海军尚未建立,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军舰,一定是国民党海军打



过来了！父亲立即打电话将“敌情”报告给连云港驻军的一位师长（具体姓名不详），这位师长问父亲，港务局方面知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船？父亲回答说不知道，有可能是国民党海军偷袭。师长一听急了，衣服也没穿好，提着裤子就下令开炮！

一发发炮弹落在黄安舰周围，激起冲天的水柱。当时黄安舰的甲板上堆满了一桶桶柴油，若是被炮弹命中，后果不堪设想！黄安舰上的官兵也急了，赶快按照事先约定的“三长两短”灯语表明身份，又撕下一张白床单，直接挂到桅杆上。可还是没有用，岸上的火炮还在一发接一发地向着黄安舰射击。舰上官兵索性拚命喊话“不要开炮，我们是来投诚的！”并不断打旗语。情急之下，黄安舰甚至放下了小艇，要冒着炮火上岸与解放军联络！幸亏港务局有个叫杨金跃的职工以前在旗台工作过，懂旗语。一看是来投诚的军舰，他赶紧和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又急忙给驻军司令部打电话告知情况，炮击这才停了下来。事后才知道，那天夜里解放军前后共打了8发炮弹，万幸的是没有一发直接命中舰体！

随后，父亲和边防保卫局、海军部队、港务局的值班人员分乘几条船围住了黄安舰。开始他们没敢贸然登舰，直到杨金跃拿手电筒给黄安舰发出信号，最终证实这艘军舰就是青岛地下党多次联络促成起义的黄安舰后，父亲他们才赶快报告市委领导并登上军舰，见到了起义临时舰长鞠庆珍。舰长指着船舱对父亲说：“下面还有狗！”，父亲很惊奇，军舰上怎么还会有动物？打开船舱一看，才知道所谓的“狗”原来是那些因不愿起义而被羁押的反动官兵！

黄安舰抵达连云港的第二天，即1949年2月14日，新海连特区党委书记谷牧接见了黄安舰起义的领导人员并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2月16日，周恩来亲自拟稿中央军委致华东局的祝贺电报，高度评价起义成功——“庆祝你们争取敌军舰黄安号反正胜利”，“这是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请转知该舰全体人员予以嘉奖”。

起义官兵登岸后，被组织起来在港口孙家山、马腰子一带训练、学习。父亲曾对接受改造的反动

副舰长老婆说：“你来了光当太太小姐不行，还要学会纺棉花！”

国民党当局发现黄安舰起义后恼羞成怒，多次派飞机侦察、轰炸。但在边防局、解放军部队、港务局的周密安排下，黄安舰不断改变停泊地点，并采取了有效的伪装保护措施，加上有解放军部队配合黄安舰顽强反击，屡次化险为夷。据父亲回忆，有一次，军舰在转移中触礁，差点碰坏龙骨。部队紧急调运麻袋等物资修补舰体，才避免搁浅。当时为了保护军舰，各部门都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有时站岗值班都顾不上吃饭。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黄安舰终于完好无损地移交解放军，被列编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领导，成为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以来的第一艘战舰，一直服役到80年代。



解放初期山东省人民政府边防保卫局连云港分局同志合影（左1为柏广恩）

在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以清正廉洁著称：在分管人事的岗位上三次将上调工资的机会让出，从未用职权为子女工作谋利；多次向灾区捐献财物，而自己和老伴却住在简洁的六十平米房子里直到百岁逝世。

父亲留给我们的财产就是无价的革命精神，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努力继承、发扬下去！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张伟敏



陇东火柴厂的那些事

陈婕 姜松林

陇东火柴厂是我市解放后首家公私合营企业



全市第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张荣山创办的陇东火柴厂(1949年7月实现公私合营)

解放前,新浦有一家名为三益的私营木材厂,平时经营些木材和木材加工的生意,兼营家具,这个私营木材厂的老板叫李明发。上世纪40年代,正是动荡的年代,李老板偶然在青岛发现了一套制造火柴杆的设备,于是就琢磨给自己的生意再增加一个项目,那就是制造火柴杆,然后返销到青岛和上海。

既然有了这个想法,李老板便开始着手了解市场,他发现连云港的市场上,做火柴杆用的杨、柳木很充足,制造出火柴杆返销青岛、上海的话,相当有利可图。但是,投资就需要资金,于是李老板便开始四处寻找投资人,经几个中间人的介绍,终于找到一个名叫张荣山的投资人,并决定双方合作,由张荣山代表投资方出资购买青岛的制杆设备,管理后期经营,而三益木材厂则以场地和电源设备作为股份投资合作,对外仍挂木材厂的招牌,对内则为独立制杆部,独自核算,各负盈亏。

然而,这个制杆部开工不久,因为社会局势变化,火柴杆一直卖不出去,被迫停产处理。直到1948年11月7日新海连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陇海铁路东海段火柴厂很少,而本地又具备非常好的生产火柴的条件,不仅原料充足,而且还有张荣山所创办的火柴杆制杆部基础,只需要再添置部分设备就能够生产火柴。

于是,当时的市政府派出代表和张荣山协商,并最终确定以公



私合营的方式,组建火柴厂,并由张荣山提出,市政府批准,把这第一家火柴厂命名为陇东火柴厂,商标为“锦屏山”牌。

开业之初工人月薪发的是粮食

火柴厂成立之初,最紧要的是工人、设备和原材料,仅靠张荣山原来制杆部的工人,显然不够。于是,除在本地招收工人培训之外,张荣山听闻青岛火柴厂停工,有不少工人失业在家,就立即赶到青岛,招收了一批制造火柴的熟练工。

这批工人到厂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商定工资。而当时商定的工资在现在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是以粮食来计量的。在张荣山关于火柴厂的一些回忆材料中,有当时工人的具体工资,制火柴的配药工和盒料工月薪小麦 600 市斤,装盒工和排杆工月薪小麦 500 市斤,旋皮工、切杆工、锯木工月薪小麦 360 市斤,张荣山以及管理人员月薪小麦 400 市斤。

工人确定了之后,便是添置设备。然而当时百废待兴,经济拮据,所谓的设备也只是大锯一台、合拌机一台,切杆机一台、人工蘸头机一台、手摇排杆机二台,除此之外,所有的工序都是手工操作。因为没有烘干机,所有的火柴杆都是靠太阳晒干的。

上世纪 50 年代末迎来全盛时期

1950 年 1 月 16 日,这个日子张荣山从不曾忘记,那是火柴厂第一次生产出成品火柴,共生产了锦屏山牌硫化磷火柴 8 件,每件 240 封。此后,火柴厂正式进入稳定生产期,并且销路很好,发展迅速。至 1950 年底,已经生产火柴 22000 多件,每件 1000 小盒。

在那个年代,有火柴之前,取火比较难。因此,从 1951 年秋天开始,陇东火柴厂的火柴开始供不应求。于是,扩大厂房、增招工人、添置机器顺理成章。那时,生活在新海连市的人们,如果能够成为火柴厂的工人,或者是家里有亲戚在火柴厂工作,都

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就这样,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陇东火柴厂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已经是陇海铁路东部地区规模最大、闻名遐迩的火柴生产企业,并逐渐成为我国火柴生产的重点企业之一。

上世纪 90 年代火柴厂逐渐走向衰败

“我是 1975 年进入火柴厂工作的,当时陇东火柴厂还是新浦街的大企业,效益非常好。”张小华是火柴厂倒闭之后失业的职工。他说,进厂之初的火柴厂还非常好,因为火柴是家家户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或者说,只要是取火就必须用到火柴。所以,那时火柴生产依然供不应求。

然而,科技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当打火机批量生产之后,火柴在取火方面的称霸地位便逐渐被取代。“大概是 1995 年这样吧,我们厂的效益就明显不行了,大家都用打火机,那比火柴方便多了,这之后火柴的销量一年不如一年,到了 2000 年这样,我们厂就倒闭了。”

张小华叹息着回忆火柴厂从辉煌到式微,终至倒闭,并逐渐消失在新浦。现如今,陇东火柴厂已经不留一点痕迹,原来的厂址也已经成为居民小区,那些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照亮我们生活的“花果山”牌火柴也只在记忆中慢慢燃烧。

(作者单位:连云港日报社,市档案局)

责任编辑 邱仕明



陇东火柴厂生产的“花果山”牌火柴商标



杯茶未扰 白银四万

——清代海州府的科举考试管见

薛明光



清代科举考试系统

清代海州是直隶州，就是直接受省的领导，有属县，级别仅次于府，多数年份，海州称海州府，长官称知府，知府的助手称参府。海州的考试单独进行。童生试俗称童子试，是取得生员（俗称秀才）资格的选拔考试，也称童试、小考。应考者不论年龄大小，均称童生、儒童或文童。童试三年举行两次，丑、未、戌、辰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考中的

童子就成为生员（秀才）。生员在领取证书的同时，领一条绿色的丝质腰带，“绿”古音“录”，即录取之意。绿腰带围身，就享受乡镇长的薪奉，故乡镇长称乡绅。童试都在清明桃花盛开的时节举行。有些宗谱上“桃浪鯤击”一词，说的就是童生试考中。据说，桃花纷落，花瓣盖严了龙门水面，小鲤鱼从桃花中飞起，跃过龙门，就变成了龙，就成了搏击长空的鲲鹏。由布衣小民，考中秀才，成为在编的“国家干部”，真有平步青云之喜。

考试是选拔人才，而朝廷派来的督考官员搭顺便车，趁机肆意聚敛钱财，要出人才，就要出钱财。每次开考之前，州县乡广泛宣传，发动百姓支持科举考试。实际上强征暴敛，按家底厚薄强行摊派，所有人家都要交钱，法定义务，不许讲价。

童生报名。童生要参加考试，就要有个举主（保举人）。这举主要由秀才、乡镇长担任。报名表上都要写清举主。如果举主与知府、参府有关系，那考中的保险系数就更大。童生请举主乡官吃上几场，再给点礼品。给举主十两银子，请举主到县大堂举荐，走路要穿鞋，故称“磨鞋费”，给县长至少百两，算是“报名费”。县长去海州府报名，领取考试通知单（准考证），同时交纳“生员证书费”。每份证书 400 两白银。海州每次开考，发一百份秀才文凭，收钱四万两。沭阳是一类县，发 26 份证书，赣榆是三类县，发 14 份证书，海州发 60 份。



督考来临。朝廷派员来海州督考，一般是翰林院的成员。翰林院大员都是四品以上，故称钦差。钦差大人坐八抬大轿来督考，前有一张锣，四把唢呐，后有四名配剑卫士，另有文书一人。海州参府早就在城西北的谢跳（张道口西）迎接。一听锣响，参府就躬身站在路边。待大轿来到，参府作揖打躬，口称“海州参府迎接钦差大人。”钦差用脚在轿底一跺，轿夫脚步不停，尽管走道。参府级别太低，没有资格和钦差说话，参府也不脸红，坦然地随文书身后行走。大轿来到海州西门外，知府早已站在大路中间迎接。朗声说：“海州知府，参见钦差大人。”钦差平轿，大轿落地，轿夫不压轿杆。知府走近大轿，用拳头掀轿帘，仅掀一道缝，拳头伸到里边张开五指，让钦差看到手心的方纸块。钦差展视纸块，上写“颐仪四万”，就是见面礼四万两白银。轻声细语：“很好。”知府退出轿杆，钦差起轿，参府快步走到轿前引路开道。砚池街路北有圣人殿，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钦差的大轿到砚池西，参府便引轿北拐，绕过圣人殿，再走中大街，直到馆驿。约半个时辰，馆驿铜锣唢呐齐鸣，抬出一张紫榆八仙桌，桌上黄绸铺展，黄绸上放白花花的二百两银子，这是钦差大人向海州交的伙食住宿费。仪仗刚出门，海州的鼓乐队便加了进来。惊天的声势，引来居民观看。队伍在大街小巷转上一圈，百姓见到了白银，也就见证了钦差的清正廉洁。八仙桌在知府门外停上一阵子，才抬进府衙。

知府送花。知府收了钦差的伙食费，便命向馆驿送花。有端盆的，有抬缸的，好样的队伍。百姓看得很清楚，缸缸盆盆都是黄沙，上面有花有草，花草也不名贵。送到馆驿，院中一放，转身就走。参府掩上大门，扬长而去。钦差扔了花枝，拨去黄沙，里面都是银子。四万两见面礼，就在百姓的眼底下，送到钦差手里。

钦差午餐。钦差的第一顿午饭，很冷清，只有一个人单独进餐，知府也不来作陪。桌上一把金酒壶，四双金筷子，四个金酒盅，两个金茶碗。二十四道菜，盘子都是白银的，盘大菜少，多为没下锅的生冷青菜。饭罢没有人洗碗刷盘，也没有提茶倒水，全由钦差亲自动手。这些金银器皿，装箱打包，可不能要外人看见，钦差自己辛苦吧！也就这个时候，钦差大

人很会做“家务活”，也没有官架子。

参府献茶。知府估计钦差已收拾好东西，便让参府去献茶。海州云台山的云雾茶，明清二朝名望极高，朝廷来人，都要带些进京，又以春茶最佳。茶叶制作精细，且特别讲究。采茶都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手指头慢慢地掐，都是两叶一尖，梗子只留半指长。炒茶也是小姑娘，要用嫩手在热锅里翻茶叶。铁铲，高粱把不许使用，烧草用豆秸花生秧，文火慢烧。说是这样的茶叶味道才纯正。茶叶箱用当年的新竹编制，里面衬不透水汽的油纸。茶叶由两人用竹扁担抬到馆驿门口，再由参府搬进去。钦差拿下黄铜锁，掀开箱盖，慢条斯理地说：“烧火也不用这等烂草。”轻起一脚，踢歪茶箱。参府赶快扶住，再抬回府衙。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茶叶箱，还是那箱茶叶，又抬到馆驿。钦差把箱盖掀个半开，见茶上四个闪光的金元宝，合上箱盖，笑眯眯地说：“这才是上等的好茶。”

钦差还要到沭阳“检查”教育情况，也是单独用餐。一把金酒壶，两双金筷子，两个金酒盅，银盘银碗。到赣榆县就是全套银器。钦差要走了，知府写个证明给拿看，上写：“×××大人莅临敝州指导杏坛杯茶未扰万民铭之记之歌之颂之”。临走，海州百姓家家在门前放张小桌，桌上立一面镜子，放一盆清水，意思是钦差心明如镜，清正如水。

钦差大人督考江宁府（现南京），海州是第一站。江宁府考场管上下两江，也就是安徽江苏二省，考场设夫子庙。钦差督教“非常”认真，两省八州三十六县，他各州各县都要督到。每州的礼品也就一马车，江宁府还有一大份。钦差“见好就收”，不厌其丰。返回京城，他要上下打点，得益的高官夸他“会办事”。向皇帝报告工作，既要呈上“杯茶未扰”的明证，又要送上几车礼品，皇帝当然受之坦然。朝廷的官员都明白督考之理，故曰：“一任主考官，三辈不受穷”。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本文根据王能德口述整理而成。王能德，赣榆县沙河人，少时读过十年私塾。王能德听举人朱寿石讲述的关于清代的科举考试内幕。）

作者单位：赣榆县沙河中学



杀害符竹庭的 凶手 冯宝岩落网记

祝新华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抗战时期曾经担任伪赣榆县警察局特高股股长的汉奸特务冯宝岩,因在赣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尤其是参与密谋杀害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将军,终于在 1959 年 5 月,在东北老家辽宁省沈阳市落入法网,并于同年 10 月 27 日,被当地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冯宝岩对赣榆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老家东北辽宁省盘锦市的冯宝岩,因为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40 年春,时年 22 岁的他在朋友介绍下任徐州市公署顾问室翻译,1941 年 10 月被编到“东亚联盟支会”任股长。1942 年 2 月,利用与赣榆县伪县长王成凯儿子是同学这层关系,冯宝岩到赣榆县警察局任特高股股长。1944 年 1 月,特高股改为特高课后,司法股、特高股合并为第三课,冯宝岩任第三课课长,同时兼任日本特务机关青口联络部翻译,专门负责领导与指挥伪警察局及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从事调查、搜集解放区军事、政治情报,并亲自带领部下调查我军兵力配备、枪支数、首长名单、活动地区及我军住地地形、地物,然后做成书面材料,分别向特务机关、新浦联络总部、日本军队以及伪县政府报告,为日伪攻打解放区提供资料。

在调查、搜集解放区情报服务日伪的同时,冯宝岩还多次抓捕我军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新四军 23 团的李文修、李陆仁二人在 1944 年 1 月被其抓捕后,押在警察局施以酷刑,后将二人送到南京下关做苦工,不久二人相继病死。同年 5 月底一天,八路军在《大众日报》刊登了妇女劳动模范赣榆县城头镇董大姐的事迹被特务看到,冯宝岩遂即安排特务将董大姐及其叔叔抓捕,因二人不畏酷刑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员,冯宝岩又将他们移交给日本宪兵队,关押数月后释放。1943 至 1944 年间,冯宝岩先后随日军到柘汪扫荡 3 次,大肆抢夺百姓的粮食、烧毁民房,抓捕多名村民,并带回警察局关押殴打,后将这些村民押至青口东门外处死。

密谋“偷袭战”成为杀害符竹庭的刽子手

1943 年 11 月,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司令员陈士榘精心策划指挥了解放赣榆县城的赣榆战役。军区主力老六团、二十三团及海赣独立营等,于 11 月 19 日晚 9 时至 20 日下午 3 时半,采取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式,全歼守城的伪赣榆保安总队第八、九中队及伪和平建国军第七十一旅大部。其中毙伤伪军 400 余人,生擒伪旅长李亚藩、团长张星三等以下官兵 2000 余人,缴获步枪 2000 余支、轻机枪 8 挺、手炮 40 余门、战马 30 多匹、汽车 2 辆。军区部队还乘胜扩大战果,攻克海头、兴庄等 13 个据点。我军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仅以亡 3 人伤 37 人的极小代价智取赣榆县城,作为典型战例,先后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等史籍。

海赣之敌为掩饰在赣榆城等地的失败,恢复其占领区,以巩固新浦、青口以北的阵地,时任伪赣榆县警察局特高股股长的汉奸特务冯宝岩,便秘密



策划“偷袭战”。

1943年11月22日,驻沭阳、灌云、新浦、青口的援敌1500余人赶到,八路军主动撤出赣榆城。日军恼羞成怒,跟踪追击,伺机报复。11月26日清晨,雾气浓重,日军突然偷袭滨海军区的机关驻地——赣榆县黑林镇马家旦头村。当时符竹庭带着警卫员房桂生到大树村检查俘虏处理情况时与敌遭遇。符竹庭身先士卒,率部反击。在战斗中,由于战马惊慌,硝烟弥漫,骑在马上 的符竹庭撞到了村寨大门的门框上,头部受到重创,生命垂危。符竹庭头部受重伤后,赣榆前线及时向山东军区领导作了报告。山东军区政治部肖华主任第一时间告诉了军中奥地利著名医生罗生特,罗生特决定立即到前线进行抢救。他和翻译方政立即出发,在两名骑兵护送下,冒着刺骨的寒风前行。由于罗生特不善骑马,骑马时只能走,不能跑,等赶到出事地点时,符竹庭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罗生特仍不放弃抢救,他全力以赴地为符竹庭做心脏按摩。一个多小时过去,仍未能挽回符竹庭的生命。符竹庭光荣殉国,年仅31岁。



符竹庭(右1)、陈士榘(右2)在指挥赣榆战役

事处当办事员,继续与人民为敌。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冯宝岩逃到天津,但一个月后天津又解放了,无处可逃的冯宝岩窜至锦州做生意。解放后,赣榆县公安机关多次与冯宝岩家乡的公安机联系,查找冯宝岩的下落,但由于冯宝岩改名,又长期隐瞒历史罪恶,一直没有确切消息。在全国解放后开展的敌伪党团宪特人员进行自新登记时,化名冯全的冯宝岩,因为家乡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将自己的过去改为在北京做生意的清白历史,花钱请两个一直在北京做生意的同学做伪证,就这样蒙混过去。

1959年初开始,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一次解放后最大规模的专项调查,对所有被登记在册的敌伪党、团、特人员再一次进行调查、甄别。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赣榆县公安机关再一次将冯宝岩的照片和相关资料寄到沈阳市公安局,请求协助查找冯宝岩的下落。当年的5月8日,居住在沈阳市皇姑区做生意的冯宝岩被当地公安机关发现抓获。经审查,化名冯全的冯宝岩交待了自己曾犯下的种种罪行。

1959年10月27日,冯宝岩被执行枪决,得到应有的惩罚。

(作者单位:赣榆县史志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隐姓埋名16年后终落网

符竹庭牺牲后,人们都以为日伪军偷袭滨海军区机关是一次无意的偷袭行动,其实不然。据公安部门揭秘的尘封档案记载,日伪突袭符竹庭部队驻地,原是早有的一起预谋。那次战斗是在伪赣榆县警察局特高股股长冯宝岩策划和带领下发起的,冯宝岩是致符竹庭等人牺牲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冯宝岩被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武工队列为重点对象登记在册待机抓捕,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形,一直未能如愿。日本投降后,冯宝岩也销声匿迹了。直到符竹庭牺牲16年后的1959年,冯宝岩才落入法网。

日本投降后,冯宝岩化名冯全逃到沈阳。1946年,冯宝岩到国民党东北统一建设委员会辽宁省办



红色纪念地

赣榆战役纪念地

本刊编辑部



赣榆战役纪念地纪念碑

赣榆战役纪念地位于赣榆县赣马高级中学院内。

抗战时期，赣榆县城(赣马)是日伪军固守新海连地区的卫星城，是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和物资储备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城内驻有伪和平建国军第36师71旅李亚藩部2000余人。1943年11月，日伪集结重兵对我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残酷大“扫荡”。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举行赣榆战役，利用“翻边战术”，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粉碎敌人向我根据地大“扫荡”的阴谋。

赣榆战役由八路军滨海军区负责实施，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符竹庭亲临前线指挥。1943年11月19日晚，战役发起，被八路军争取过来作为内线的李伪第142团一副官，带领化装过的八路军突击队进入城内，首先歼灭了守城门的伪军一个排，随即主攻部队六团二营和二十三团一营迅速进城，向伪旅部和141团、保安队、盐警发动猛攻，战斗至20日胜利结束。

赣榆战役，我军采用“军事打击，政治争取，里应外合，全歼敌人”的作战方案，仅用不到20小时的时间，毙伤伪军400余人，生擒伪旅长李亚藩、团长张星三等以下官兵2000余人。而我军仅牺牲3人，伤37人。赣榆战役胜利后，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均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胜利消息，称之为敌后攻城的范例。新中国成立后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等军事巨著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赣榆战役，作为抗战史上的著名战例，永载史册。

1991年，中共赣榆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赣榆战役旧址建纪念碑一座。1995年6月，赣榆战役纪念地定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物保护单位。



板浦美食

豆丹

潘友国

我的老家古镇板浦，有一道化腐朽为神奇的菜，久负盛名、闻名遐迩，已在餐桌上闯荡千余年。它的名字叫豆丹。

豆丹，俗称“豆虫”，别名豆参、豆度等，是豆天蛾的幼虫。成虫体长约 8 ~ 9 厘米，以大豆叶为食，对大豆危害极大。

老家海州板浦位于江苏北部，这里地势平坦，

南北、东西走向都有河流穿过，排灌方便，旱涝保收，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由于板浦油料作物以大豆为主，所以“大豆之乡”也就成了“豆丹之乡。”

每当盛夏时节，大豆成熟前期，豆天蛾的微小幼虫从卵中破壳孵化出来，在大豆植株的枝叶爬来爬去。它危害豆叶，啮成孔洞，严重的植株尽成光秆，颗粒无收。

豆丹虽然是大豆的天敌，但它的肉浆却无毒无害，是一种特佳的高蛋白食物，做成菜肴，十分鲜美。豆丹不仅是一道美食，亦是一味良药。据医学认为，豆丹无毒，有养胃健脾、补肾强筋之功效，还可治疗营养不良等症。

老家板浦人对豆丹其独特的美味有着与生俱来的爱恋，或烧或蒸或炒或氽汤或炸，创造出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烹调方法，使之成为板浦菜最重要组成部分。“板浦豆丹甲天下，古今中外独一家”是老家广为流传的民谣。

豆丹原是一种外貌丑陋，令人生畏的小虫。善良、勤劳、智慧的板浦人，为中国美食谱增添了这一道美味，不仅有与最先吃螃蟹者一样的勇气，而



化腐朽为神奇的美食——板浦豆丹



且还善于掩其“丑”，而取其“甘”，为饮食美学提供了一个“化丑陋为美”的范例。

板浦人将提取豆丹的动作，不叫“逮”也不叫“捉”，而是称作“拿”，很是奇怪。他们将“拿”来的豆丹入饌，食法五花八门，红烧、做汤、清炒，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一盘开胃的美食。

二

豆丹菜成名已久。成名何时？如果追溯历史，源于唐朝，到了清朝名气倍增。屈指算来，美食豆丹已经有千年的历史。

花香自有蝴蝶来。老家的板浦豆丹声名远播，所以吸引了、牵动着无数老饕。

诗人兼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豆丹有过这样的描述，“庖制味甘真上口，调来火候贵中和”，甚至用“秋风鲈鱼寻常美，暑月鲋鱼亦逊色”的诗句，形容豆丹到了让海鲜相形见绌的地步了。

清《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在《农蚕经》写道：“豆丹，拿之可净，又可熬油。法掐头，掐尽绿水，入釜少投水，烧之碟之。久则清油浮出，每丹一升，可得油四两，皮焦亦可食……”

清板浦才子许桂林“豆丹作酱盘餐美”之句，便可佐证。清作家李渔感慨说：“浦人口流涎，南人悄避席。”

豆丹这道美食穿越了千年的时空，更加受到了现在文人的青睐。

《海州乡谭》作者彭云吃过板浦豆丹感慨说：“板浦豆丹真是饮食史上的一个奇迹，食后余味绕梁五日不去，令人流连忘返。”

市民俗协会主席崔月明对板浦豆丹也倍加欣赏，每一次品尝后说：“板浦豆丹，我所欲也。”

市文联主席张文宝每次来板浦，必食豆丹，一尝为快。

李汝珍纪念馆杨光玉杨馆长说：“我来板浦二十余年，吃遍这块土地上所有的饮食，唯独豆丹食后让我荡气回肠。”

地方文史研究学者张名艾对板浦豆丹也情有独钟，他品尝后总是忍不住赞道：“美哉，板浦豆丹甲天下……”

乡贤姚祥麟在《板浦春秋》一书中说：“豆丹，板浦人舌尖上的美食。”

几年前时常有外地朋友来访，我在板浦海林饭店用豆丹招待他们。朋友初见餐桌上这一丑陋的肉食，吃惊不小，开始不敢下箸。在我的鼓励下，品尝了一口后，便左一筷右一筷，往嘴里夹，一边吃一边忍不住惊呼：“真是人间美味！”

三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享受一方美食。

以前豆丹价格很便宜，每年的七八九月，豆丹一上市，老百姓争相“拿”之，无法“拿”之则花钱购之，烹而食之。

每年的这个时节，老家板浦人的豆丹情结，所给予我的，是最真切的记忆和最深厚的文化印象。

老家的大街小巷，到处都看到许多人在擀豆丹，大大小小的碗、盆、碟都装满豆丹。老家的街巷上空都飘荡着浓浓的豆丹味，香气四溢，随风流转。

豆丹贯穿了我的童年。

孩提时，每到这个时节，我的母亲也跟所有的板浦人一样，买来豆丹烹制给我们吃。豆丹最好吃的食法是红烧，在我们家最常见的是用小青菜烧豆丹。母亲烧的豆丹别具一格，异常鲜美，令人回味无穷，食之难忘……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豆丹一夜之间，从奴隶到将军。

现在的板浦豆丹，已经不再是一道普通的小吃，其身价一路暴涨，它已成为各大宾馆、饭店菜谱上的座上宾。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豆丹不再是时令菜，一年四季都可吃到。据说豆丹冬季最贵时一小盆能卖上七八千元。

当我正在写这篇文章时，又到了豆丹上市的时节，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熟悉的美味……

（作者单位：板浦初级中学）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海州文庙 乡贤祠

张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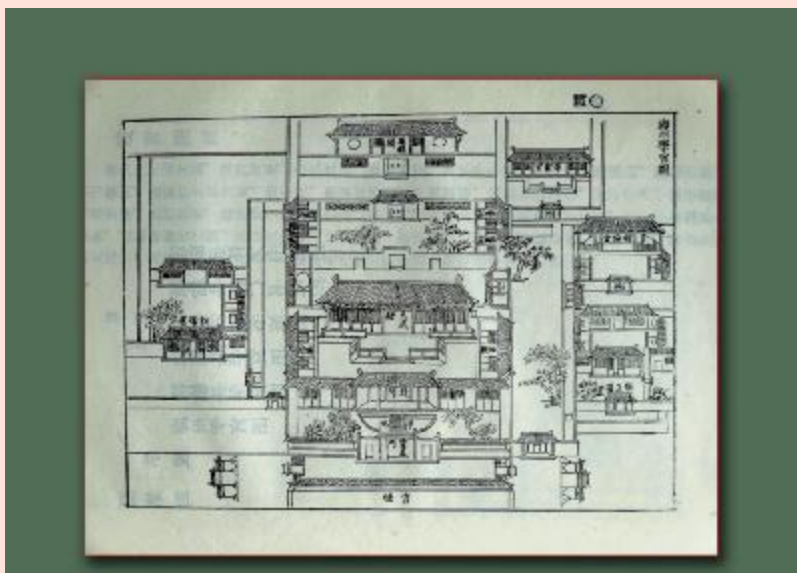
乡贤祠是祭祀当地德行卓著人的祠堂。乡贤，即出生在当地，学识或品行受人尊敬的人。据传说，在周朝时已经有在祠堂中祭祀乡贤的行为。宋代、元代之后，乡贤祠渐渐与孔庙官学结合，成为庙学建筑群的一部分。明朝中期之后，祭祀乡贤的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明代自嘉靖、万历开始，乡贤祠逐渐迁移到文庙。有的地方文庙就是学宫，有的地方把学宫建在文庙内或文庙旁，更能突出乡贤祠的教化功能。由于乡贤的教化，使一些百姓见贤思齐，

促成百姓向士人靠拢、士人向乡贤靠拢，有助地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海州乡贤祠位于海州文庙内。笔者在《海州文庙名宦祠》中介绍了海州文庙名宦祠的情况，同时也述及了海州文庙中乡贤祠的位置：过了戟门就是大成殿，大成殿后一庭院，东侧设有名宦祠和五贤祠，五贤祠即乡贤祠。西侧为忠义祠。

名宦祠与乡贤祠同立于文庙内，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乡贤祠所祀人物是“生于此地而有德业、学行

博于世者”。也就是说，乡贤必须是本地人。名宦祠所祀人物是：“仕于此地而有政绩，惠泽于民者”。顾名思义，名宦祠是清一色的官员，名宦祠所得祀者须讲求政绩，在任期间需要惠泽一方人民。入祀名宦祠的必须是外地人在本地的为官者。乡贤虽然不像名宦一样都是官员，也大都是有功名在身，曾经为官的人。入祀乡贤同样要看生前政绩是否利民，乡贤强调“德行”和“学行”，而名宦意在“政绩”。供奉的形式主要是将乡贤的名字刻在木板上，再在木板四周加以装饰，称作“木主”。其样式与旧时人家的“亡人牌”一样，只是这些木主较人家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学宫图》



的木主大一些,装饰更繁缛、考究一些。较大的乡贤祠中有时还塑有乡贤们的神像,另外往往还竖立或在壁上镶嵌一些碑刻,详细记载他们的事迹。

那么名宦祠为什么又叫五贤祠呢?对于五贤的解释多种多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五贤的指认往往不同,但大都指春秋晋文公的五位贤臣: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明代海州旧五贤祠(即乡贤祠)位于海州州治东,察院西。奉祀的五位乡贤是汉代的疏广、疏受、萧望之、于定国、匡衡。二疏指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汉书》对二疏有传介绍。疏广字仲翁,官拜太子少傅,为皇太子的老师。疏受字公子,在疏广升为太子太傅时被举为太子家令,后被提拔为少傅。他们居官五年,这时,疏广对疏受说:“我听士人说过人知道满足就不会再遭受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可以长久。如今我们功成名就,再不离开这里,我担心迟早会后悔的。”当日上疏要求辞官归里。皇帝准许辞官。临行前赠送黄金二十斤,皇太子又加增五十斤。疏广、疏受回到自己的家乡。用皇帝赐送的金银置办酒席,召家乡父老欢饮。广散金银,接济穷人,不治田宅。亲友们劝疏广应该为子孙考虑。多留些金银给他们,疏广却说:“我何曾不想着我的子孙呢?儿孙自有儿孙福,钱财并不是好东西。儿孙如果有本领,钱多了反而会影响他们克勤克俭艰苦创业;如果是个庸才,那又会使他骄奢淫逸招来横祸。”据清代陈宣著的《海州志》载:“二疏墓在东海平山”。清代李普元的《东海志》称“(二疏墓)在万金湖北岸平山东岩下”。赵一琴《续东海志》称:“与沃壤山连麓,平山东岩有二疏墓”,还有散金台等遗迹。宋代在海州、平山都建有景疏楼,以纪念这二位乡贤,苏东坡还在景疏楼上吟有“长忆别时,景疏楼上”的诗句,流传至今。

萧望之(约前114~前47年),字长倩,是萧何的六世孙。萧望之是西汉宣帝、元帝倚重的大臣,又是著名的经学家。萧望之主治《齐诗》,兼学诸经,是汉代《鲁论语》的知名传人。今连云区的庙岭古代称作钓鱼台,相传萧望之曾经在

此钓鱼,故名。明代顾乾《云台山三十六景》称这里为“钓台夜月”,《云台山志》上录有多首咏“钓台夜月”的诗,顾乾的诗写道:

何处明月好,萧公古钓台。岚浮青嶂合,云敛碧天开;

素彩凝碧谷,寒光净草莱。坐当如水际,仙境绝尘埃。

于定国(?-前40年)字曼倩。少时随父学法。为狱吏、郡决曹。宣帝时,任廷尉。为人谦恭,能决疑平法,被时人所称赞。后为丞相,封西平侯。我市历史上的著名冤案——东海孝妇被冤杀,就是因于定国的帮助才得以昭雪,至今我市还保留当年于公住过的地名——于公瞳。

匡衡(生卒年不详),字稚圭,西汉经学家,以说《诗》著称。元帝时位至丞相。至今我市的南城还保留有一眼匡衡井,并流传着匡衡凿壁偷光苦读诗书的故事。



今日匡衡井

清嘉庆年间五贤祠内的五位乡贤的木主分别是明代的王规、丁泰、陈昂、乙瑄、张朝瑞。王规



(488—536),好学有口辩,举秀才,袭封南昌县侯,累官左民尚书。迁太子中庶子,辞疾不拜,于钟山筑室居住。著《续汉书》二百卷,又作文集二十卷。我市南云台山南麓的诸麻村相传即明大理寺王规故里。还有王规、王璟祖孙读书处,名“上学堂”。丁泰字时亨,明代人,由举人试吏部第一,授户部主事。立朝以刚正自持,人呼为“铁面丁”。陈昂,资料不详。乙瑄字崇碧,由进士改授庶吉士,转吏部文选司主事,擢吏部郎中,清廉刚正,老年回乡时,“惟图书数卷”。张朝瑞(约1536—1608)字子祯,中进士后,历任县令、知府,清正廉洁,朝廷考核全国官员,张朝瑞曾被列为“天下清官第一”人,升至济宁宪副。因有政绩,入朝为大鸿胪寺卿。

这五位乡贤实际上是众乡贤的代表,后来的“五贤祠”中的“五”已非确数,多用“五贤”表示乡贤众多。那么海州乡贤祠内到底供奉有多少位乡贤呢?《隆庆海州志·卷五·教典》:“乡贤祠,在海州崇礼坊街北,今环入圣殿西。弘治十四年(1501年),州判林廷玉创建,有记。隆庆元年(1567年),知州高瑶申准主事丁泰、参议乙瑄入祀。六年,知州郑复亨重建祠宇,神坐木主雕刻一新。”《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乡贤祠,旧州志:‘即五贤祠,在大成殿后之东,名宦祠北。’今案:旧志不详姓名,考明金铎、林廷玉《乡贤祠记》,互有异同。”他们在《乡贤祠记》中认为:“海州古旺郡也。环郡多名山大川,东滨沧溟、胸。羽、夹谷皆在境内,神秀所钟,名贤代兴。”

林廷玉,福建侯官人。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以工科都给事中身份贬谪海州任判官。他在《乡贤祠记》碑刻中写道:弘治十二年刚来海州时,看到乡贤祠里供奉的乡贤挂漏严重,且祠宇简陋。于是在学宫右偏一些的地方购地一块,前建大门一楹,后建祠宇一栋,弘治十四年建成。在祠宇内奉祀乡贤四十多人,以朝代先后为序。

金铎和林廷玉的《乡贤祠记》,详细的记载了海州乡贤祠中供奉的历代乡贤的名单,互有异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据《淮安府志》记载,海州乡贤祠旧祀46人:周代的鲁人郑国、东海人孟卿和后苍;汉代东海下邳人翼奉、东海郯人于公及子于定国、孙于永,东海兰陵人萧望之及其子萧育、萧咸、萧

由,东海兰陵人疏广及其侄儿疏受,东海承人匡衡、东海戚人马宫、东海兰陵人毋将隆、东海郯人薛宣;后汉的东海人卫宏、东海兰陵人王良;三国时的东海郯人刘虞、王朗及其子王肃;晋代有王肃的曾孙王雅及鲍靓;南北朝时有东海人何无忌、徐勉、徐擒及其子徐陵、徐孝克,东海郯人何思澄及同宗何逊,子何朗,东海郯人徐羨之、孙徐湛之;隋有东海人包恺、鲍泉,唐有徐有功;海州人吴通元及其弟通微;宋有海州人孙傅、海州怀仁人胡松年、海州人邱岳;明代的海州人王璟、丁泰、乙瑄、张朝瑞等。

从这些榜上有名的乡贤来看,很明显,海州乡贤祠入祀的这些乡贤,是以古代东海郡的范围来择定的。范围远远大出了“海州”的范围。《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案语中写道:“六朝以前,东海守相皆非今之海州”,并列举了21位乡贤的名字,说明他们“均非海州人”。并且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拾遗录·杂说》中作出了详细说明。但是“然载在祀典,有其举之,莫敢废也。故仍列其名于祠宇之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良吏人物传中则分别去取,以昭核其实焉”。

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人物一·列传》里,明确记述入祀乡贤祠的明代的海州人有:王规(海州人)、厉达(海州厉家荡人)、丁泰(海州人)、张鹏(沭阳人)、乙瑄(海州人)、董杰(赣榆人)、邵思忠(赣榆人)、裴天佑(赣榆人)、阎大祥(赣榆人)、张朝瑞(海州人)10人。

乡贤是“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只有“遗爱在人,乡评有据”者才能有资格入祀乡贤祠。这些乡贤一般都是品德高尚、风节著闻、文章显著、政绩卓著者。乡贤祠的设立,有助于教化人民,使他们见贤思齐,以乡贤为榜样。同时乡贤祠也有利于净化风俗,使民心归厚,使有功德于国家和人民的人死后能够永享俎豆,流芳百世。曾经入祀海州乡贤祠的列位乡贤,他们都是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芳名的贤者,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永远留在连云港市的史册上。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溯史读志话羽山

时麟



羽山之巔

羽山,位于苏北鲁南接壤处,山的阳坡今属江苏省东海县,距县城牛山镇23公里;山的阴坡属山东省临沭县,距县城临沭镇31公里。山体为东西走向,长约2公里,南北宽1公里多,呈笔架形,主峰海拔269.5米。从以上数字看来,羽山是被两个行政区域分治的交界山,也是一座低矮、面积不大的小山。

浅析羽山的命名

地球上许多名山都有“命名”的历史渊源,那么,羽山以“羽”字命名的缘由是什么呢?

在周、秦时期成书的《尚书·夏书》里,有著名的《禹贡篇》,在《禹贡曾氏注》里提到了羽山名字的起源:“羽山之谷,雉具五色,因以羽名,下有羽渊”。这就告诉人们:当初因为该山上有一种鸟叫雉,它身上长着五色羽毛,非常漂亮。于是人们就以该鸟的羽为该山命名。

《禹贡》保存了我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资料,很有权威性。但是它没有进一步深解鸟羽的价值。因为鸟的羽毛很轻,即使它的色彩漂亮,也不过是“轻于鸿毛”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的先祖为何要用没有分量的“鸿毛”去为一座山命名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恐怕就要从当年先祖们对鸟的认识说起。据史料称,我们华夏远祖(氏族时代)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也就是说,人们把某种动物或植物视为本群体的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将其作为本部落的图腾,对其崇拜、神化。比如伏羲族以龙为图腾,黄帝部落以熊为图腾,炎帝部落以羊为图腾,等等。这里要说的是:当年以黄帝之子少昊(名挚)为首领的东夷部落的图腾正是鸟。原因是挚即位时,恰有凤鸟(凤凰)飞来。于是,凤鸟就成为部落的图腾。不仅如此,该部落的百官职务也以鸟命名:比如,主管历正的官职叫凤鸟(凤凰)氏,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职叫玄鸟(燕子)氏,掌管夏至和冬至的官职叫伯赵(伯赵鸟)氏,掌管立春和立夏的官职叫青鸟(鸪鸟)氏,掌管立秋和立冬的官职叫丹鸟(雉)氏,等等。

少昊氏以鸟命名本部官职的内情,到了春秋时期,他的后人、郯国国君郯子曾经向鲁昭公作了精辟的阐述。连孔子闻知此事后也佩服郯子的知识渊博,于是后来也就有了“郯子师仲尼”的一段典故。

既然凤鸟在东夷部落有崇高的地位(凤鸟是传说中的吉祥鸟),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当初在羽山上发现了长有五色羽毛的鸟之后,先民中的饱学之士是否会引经据典、以其为“天生的吉祥物”而大加渲染呢?这是很有可能的。果如此,用这种鸟的羽毛作为山名,岂不是顺理成章。

另据1994年编纂出版的《东海县志》记载:“羽山为古人类羽民的居住地,羽民在中国大陆东迁南北美洲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印第安羽蛇文化。”由此可知:当年羽山一带的人就有“羽民”之称,他们以对鸟为图腾也是可以



相信的史实。

在这里,不论是先有羽山之名而后有“羽民”,还是先有“羽民”之称而后有羽山,都说明鸟羽在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解读羽山的名气

羽山以美丽的鸟羽命名,但不一定就能因“羽”而出名。以笔者浅薄之见,该山出名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羽山与当年鲧和禹的治水有密切关系

在我国古老的文明史中,尧舜时期鲧和禹父子治水的事可谓家喻户晓,而这件事正好与羽山有关。羽山地处我国黄河流域下游、居沿海中部地区。当时,它的周围是千里旷野,且气候宜人,非常适合于人类生存。先是,原始的氏族羽民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一部分羽民东迁南美洲之后,到了夏、商时期,这里又成了东夷人繁衍生息之邦、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不料,尧、舜时期洪水为患,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羽山周围也成为洪水重灾区。为此,当鲧和禹奉命治水时,“水中孤岛”羽山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的落脚之地,因而受人注目。特别是鲧和禹父子俩治水的结果截然不同,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即:鲧失败了,被斩于羽山,成为“千古罪人”;而禹胜利了,成了万世流芳的英雄。

关于鲧和禹治水的功过是非,已载入史册的,以“殛鲧羽山”最著名。《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而鲧被杀之后,又派生了“鲧化熊入羽潭”(或称羽渊、羽泉)的神话(见《左传》)。而这羽潭怪得很,明《隆庆海州志》依据《左传》的记载,引申说:“羽泉亦谓舜殛鲧处,其水常清,牛羊不饮。”清《嘉庆海州直隶海州志》又加以发挥,载:“鲧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池上多生细柳,野兽不践。”——这些史志步步深入,从殛鲧、化熊、入潭,又写到潭水不可“侵犯”(也可能是因鲧化熊后入渊,使水腥臭不能饮),终于完成了这一神话的结局。而正是这一系列神话,给羽山罩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为此,在羽山上也就有了殛鲧泉、三缝石(又名试剑石,相传是当年天神斩杀鲧之前试剑砍成)、凤凰石、禹王庙等名胜景点。其中的禹王庙,当然是为纪念大禹而建的圣殿,但不知建于何朝何代,如今只剩下零星的砖石遗迹。——正因为这里有正、反两方面治水人物的遗迹,才使羽山出名。

二、羽山附近有个天然温泉

在羽山之南5公里处,有个水量充沛的天然温泉,其水源自羽山地下深处,千百年来裸露于野外。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人把温泉改造成商业浴池。随着营业面的逐年扩大,温泉也越来越有名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笔者有一天到温泉洗浴,见那里已经发展成以洗浴、疗养为中心的小集镇(温泉镇)。许多外地人都慕名前来洗浴、疗养,温泉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羽山温泉的水质很好,水的常温高达摄氏79度多(一说88度),能洗疗多种皮肤病。笔者那次从浴室出来后,看到在温泉浴池的出水口处,有人正用流出来的污水洗烫死猪,边烫边刮毛——其池内的水温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池内的热水必须随时加冷水勾兑,才能洗浴)。

三、旧中国的“乱世”从负面使羽山“恶”名远扬

查看史书,羽山在中国的任何朝代都远离州县,且交通闭塞,是山高皇帝远、官府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因此治安混乱。特别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有“羽山到磨山,蠹贼出万千”之说。到了民国年间,这里的兵灾匪祸尤甚,令人望而生畏。当然,这不能归罪羽山,而是旧社会制度使然。可“乱世”的确是它“出名”的原因之一。

羽山是特殊的教材

羽山虽然有名气,也有几处景点,但如果从观赏角度讲,它实在不值一提。然而,与羽山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却是该山的内涵,即它的灵魂,它的魅力。

一、“殛鲧”事件是生动的法治教材

“殛鲧”作为历史传说,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尧舜时期国家政纪严明,官员如果工作出现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论职位高低,都要受到惩处、直到处以极刑。以鲧为例,既然他能被尧委以治水重任,肯定是尧身边的高官或亲信。然而因为他治水失败,就被断然斩杀,这说明尧和舜都是依法治国、用人赏罚分明,做法值得肯定。二是,鲧治水失败,是因为他没有按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办事——水往低处流,宜疏导而非堵截。可是,面对滔滔洪水,鲧一味地带人用土去拦堵,结果是劳民伤财、费力而无功,搭上了自己的性



命。

联系到现实,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们举国都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各级政府不是也需要政纪严明、奖优罚劣吗?

二、消失的殛鯀泉是对违反客观规律者的警示教育教材

殛鯀泉又名鸡冠泉(当地人为避讳“殛”字不吉之意,取其谐音之称),原来就在山顶显眼之处。泉口约菜盘大小,里面的水黑黝黝的,长年不干,深不可测。可是,1958年“大跃进”,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有人想叫该泉扩大水量,竟用炸药爆炸泉口,结果炸乱了水系,那泉不但没有扩大、而且永远地消失了。

殛鯀泉的消失,使人回想起那“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发作的年代,“五风”劲吹,“假大空”盛行,许多事情不堪回首。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据笔者所知,当年提出炸泉的公社干部、后来的临沭县水利局长张廷芳,恰恰是一位心地善良、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热心水利的好干部。然而,在那种狂热的政治气氛中,他为形势所迫,一时头脑发热,竟做了件违反自然客观规律的糊涂事,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件事不单是他本人的错,也是中国大跃进的悲剧之一。像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今人记取吗?

说到殛鯀泉的被毁,我还想起另一件事:有一年,我到东海县城办事,路过一个临街的展览橱窗前,见里面陈列着羽山的图片,还有一段赞美性的说明词。看完之后,我突发感叹:“遗憾的是,恐怕再有一百年,羽山就不会存在了。”——那些年,因为我经常路过羽山,看到该山因滥采石料而遭到严重破坏:山的东坡有几处因采石被削成了悬崖,南坡的植被也因采石被大面积损坏,岩石裸露,惨不忍睹。这种人为的破坏行为,其危害较之炸毁殛鯀泉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羽山是不会说话的“石头堆”,但是它的沉默就是无声的抗议。如果人类不保护它,终有一天,它会用“自我消失”的方式来报复人类。

羽山在呼唤科学开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房地产和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宝地”羽山。几年前,在南坡属江苏省东海县的那一半山体,被拦腰劈成几块梯形平坡,建了个大禹山庄,盖起了依山望水的(山下有水库)别墅群,楼群前还有大酒楼;同时在山顶雕刻了一个“老寿星”的头像。

可是,后来听说南坡的有些项目开发效果并不理想。2013年春,笔者路过羽山,果然看到:山半坡上的32座别墅楼只住进一两户人家(据说别墅已由县政府管理,用于奖售给为东海县投资多、上大项目的客户,价格特优);而由上海开发商承建的大酒楼,则因开发者放弃投资而停建,只留下大楼的钢筋水泥框架,成了半拉子工程;发人深思的是,山上当年的天然树木不见了,却在别墅区的登山大道两侧,新栽上从外地用重金买来的老树、大树,为了保大树成活,有的树正在“打针”(输营养液)。

有意思的是,山坡下的羽山水库(现代羽潭)虽然水质很好,可是夏天“拒绝”游人下水洗澡,因为水里水蛇很多;像古代的殛鯀泉那样,不允许人类“侵犯”——这也许是开发者当时没有想到的“怪事”吧!

至于山北坡的临沭县一边,就更谈不上开发了:几年前有人在山脚下开了小饭店,因没有人去吃饭,改办了养鸡场,如今因为赔本,连鸡也养不成了……

亲眼看到羽山的开发项目现状,笔者对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又有了新的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新的时期、市场经济背景下,开发羽山应该有严格的科学规划,决不能再急功近利了。否则,半拉子工程可能还要在山上出现,空置的建筑物也只使羽山减色,扫游人的兴致!

在这里,笔者无意给开发者泼冷水,而是衷心希望他们能重振旗鼓、有所作为。同时也建议他们在开发、利用羽山时,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量力而行;更要保护生态环境,真正把羽山建成苏鲁两省、乃至名闻全国的观光、疗养胜地。

(作者单位:山东临沭县史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徜徉吕母遁岛处

吴成芳



朝阳西山吕母窟

我市境内的云台山,是一座充满着众多人文历史,与壮美秀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好地方,她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众多游人的目光。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孟浩然)。在春意盎然的一天上午,与市区几位友人驱车沿着海连大道前行,过了猴嘴山头三四公里处,远远眺望:南云台山南北殆数十公里,峰联岭属,或起或伏,宛如屏障,横亘东边。从群山中间的巨平山下,陡然伸出

一座孤伶伶的小山头来,周围长约十多里,海拔 226 米之多,称作西山,也叫吕母窟。它东枕江苏省最高 624.4 米的玉女峰,西卧黄海岸边的盐滩、农田。

历史上对吕母窟的称谓由来已久了。《太平寰宇记》:“在东海县北三十七里巨平山南麓上,高二里。王莽时,琅琊海曲吕母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母招亡命数千杀县令,复还海中,保此为窟。”小小的山头留下的是一段历史,是一道人文景观,令今人前往一睹为快。

当年的吕母遁迹海中的一座山头,史书有过翔实的记载。《汉书》、《后汉书》载:西汉末年琅琊海曲县有一个叫吕育的青年,忠耿好学,与母相依为命,经营其父留下的一份家业,后出任县游徼,掌一方巡察、辑捕。天凤元年(公元 14 年),因他未按县宰吩咐,去惩罚那些交纳不起捐税的老百姓,而被县宰杀掉。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吕母更是悲痛万分,就暗地聚客,预谋报仇。由于她家有丰厚的家资,就酿制了大量的醇酒,购买



了刀剑、衣服,少年来酤酒的,全部赊给他们。几年后财产散尽,少年们皆欲偿报。于是吕母聚众哭着道出了自己的心愿:所以帮助大家,救济你们,不为别的,只因县宰不公道,枉杀我儿,想请大家帮助我报仇雪恨。众人听后很感动,表示愿随她起事。主要因为:一来为正义之气所激;二来多次在她家饮酒中受到吕母恩惠,早已结下了深厚情谊。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吕母当即发动了数百人,很快发展到上千人,自称为将军,亲率农民起义队伍,攻破县城,杀其县宰以祭子墓。攻破县城后,起义军威名大震,吸引了大批贫苦农民,队伍迅速发展数千上万人。为保存实力,避开官兵的锋锐,一路攻城夺库,积聚后勤物资,带领起义人马渡海遁迹海岛——郁洲山。

海中的大岛——郁洲山,是一处天然屏障。《山海经》曰:都州在海中,一曰郁洲。历史上这里十分险要:“连山阻海,南北要冲,外为岛门之屏障”。古《云台山志》:“云台本名郁洲山,周三百余里,为淮、黄之尾间,自古在大海中。康熙五十年(1710年),海退淤淤,始通陆路”。据史书记载,历史上有很多仁人志士避乱亡命海中的郁洲山上。古人曾咏诵:“田横岛连吕母窟”、“巢穴从今靖吕孙”,就是说的在楚汉战争中的田横为避汉逃到今云台山的髯峰上;汉时琅琊吕母招集亡命,自保东海巨平山;晋孙恩浮海,北走郁洲,等等史实。这些不正说明古云台山在过去的年代里引人注目,十分险要而易守难攻吗!

今天人们来到这里,最想看的是那些静静地躺在山顶上,古人留下的那些历史遗迹。昔日吕母带领起义军队伍在此山顶筑城固守,留下了一段传奇佳话:他们不畏强暴,敢与官府黑暗残暴说“不”,英勇顽强的高风亮节辉映千古,令后人无不慕之。跨越数千年的时空,至今在这里还代代相传着那早已逝去的久远的故事。

要上山,不管你从那个方向,都非易事。来到北边山根底,在当地人的指点下,从一条涧沟旁曲折上行,虽凉风飏飏,人们都热情满怀。山坡上少有路径,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上攀登。这面山有不少处是裸崖滑坡,稍不注意,立足不稳就会滑落下来,再择路上行。有时只好手脚并用,手扒岩坡,脚蹲石

板;有时还要攀杂树藤蔓,缓缓前进。快到山顶处,一位多次到这山上考察过的闫老师,手指向荒草杂树中,露出的是一丛丛用乱石堆砌的物体显映其间,这些就是古人在此处构筑的掩体;三个一组,共有十二个。大小不一,依山形位置而建,大的洞长约七八米,容十几二十人;小的也有三四米,约能容三五人。人们看到这些物体,令人们猜想:古人是为了迎敌攻打,隐蔽、躲藏自己,还是为了生存,而遮风、避雨、休息之用呢?历史将会作出明确的答复。再向上行到那些现存的一个个掩体的后面,又出现依山势用碎石而垒砌的城墙。由于年代久远,人为或自然灾害,包括数百年前(1668年)的郟庐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破坏,残存下来的石墙看上去墙体上下起伏,曲折逶迤。长的一段有十多米,短的一段也有四五米,断断续续面向东南唯一进出此山的通道。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一切,让人们想到当年吕母和起义队伍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保住自己和兄弟们的生命,用双手,用汗水而建造了这段足以御敌的古城墙。

它无声地告诉人们,在那段久远逝去的年代里,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也是历史的最好见证。再向上爬,一块巨石像巨鹰一样,尖嘴细脖,又像一把利剑斜插蓝天,凌空矗立,它的下面能容数人,这里可谓是真正的山顶。站在山顶,试一向下临之,陡峭墙立,势峻险绝,壁立千仞。引手援树下顾,目眩心悸,不知所措。遥想昔日吕母及其义军在这岛山上固守,居高临下,环顾四周,能够沉着应对来敌,抵抗官军的进攻。吕母他们在这里坚守阵地三年,成为官府的一大隐忧,也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王莽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

徜徉在这座古人曾经浴血战斗过、古在海中的山上,古人的选择,令今人不得不佩服吕母及其起义队伍的睿智,历史会永远地记住他们啊!今天的吕母窟是一处满载古老故事地方,近2000年的岁月沧桑,留下的是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单位:新浦区人大)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连云港市治水碑(四)

张卫怀

王佐良浚金蟹泉碑



浚金蟹泉碑

金蟹泉位于赣榆县赣马镇半路村北(靠近塔青干渠处),泉侧原有一石碑名王佐良浚金蟹泉碑。该碑高 175 厘米、宽 80 厘米、厚约 20 厘米,原碑身插在碑座赧厝上。该碑现存于赣马高级中学院内。

金蟹泉,传说泉中有一金色螃蟹,故称“金蟹泉”。清康熙年间,知县李俊有(湖北汉阳人,康熙四十七年始任赣榆县知县)把泉子改为水井,水仍甘

甜,百姓受益不少,民众称之为“李公泉”,并勒石作记。后年久干涸。民国 8 年(1919 年),县知事王佐良进行整修,复名“金蟹泉”,并勒“金蟹泉碑”于井侧。碑文由王佐良撰写,进士王思衍书丹,隶书。碑文如下:

治西二里玉带河之陂有泉曰“金蟹”,康熙间李令浚有浚为井,因称“李公泉”。久湮,碑仆他所。县治濒海,地卤水恶,西走河往复十余里,役夫苦为。己未春续修县志,检旧志得之刻。即捐贖,属邑人祁相廷询察故迹,洪客淤还其旧深丈许,陋甚,原出积沙为磬土所侵,反不得畅。因扩而深之,易以砖益增,乾出於平地,防夏秋涨涝。为永改计,事竟三月,仍题“金蟹泉”。不能效谢墩之寻,亦不欲踵李公之市也。“色白味甘”,旧志非诬尔。赣榆县知事临沂王佐良重浚记,辛亥后八年九月古兰陵王思衍书丹并额。

王佐良(1872~1935)字纬宸,山东省沂州府兰山县王朱樊(今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人,清江西省南赣镇总兵王得胜次子,捐资秀才、贡生,授江苏省候補道、资政院议员。民国元年任民国海州军政支部长,授少将衔;同年任赣榆县民政长,后改为县知事。民国 8 年主修《赣榆县续志》4 卷、附编 2 卷,编写《树艺浅说》一书。

王思衍(1866—1938)字仲蕃,号源亭、亦器子,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人。诗人,书法家。20 岁以诗名领沂州府“四才子”之首。1898 年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因对慈禧太后放弃国都不满而未随“驾”西逃,愤归故乡。事后朝廷征召入京补写被侵略军捣毁的宫廷匾额,留任



旧职。1910年因病归乡，田园生活20余年。1936年曾倡议修复已坍塌的愀河大桥，并和友人王天乙等到临沂卖字筹集修桥资金。他为人耿直，从不攀附权要。当时驻防临沂的第五旅旅长李森多次向他索取字画，都遭拒绝。1938年日军占领枣庄，因耻作亡国奴愤而自缢。

张振汉浚云河碑



张振汉浚云河碑

碑原立于南云台山东磊下河边老公路旁，以后被当做桥板砌于桥上。碑正面朝河水，已风化。背面朝上，碑文清晰可见。现移入云台乡政府院内。此碑高190厘米、宽95厘米。正面为“工賑紀念碑”5个隶书大字，上首为“连云港市长张振汉题”，下首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立”。“工賑紀念碑”5个字，字高25厘米，宽30厘米，上下首为楷书，字高8厘米、宽8厘米。背面碑文为隶书，字高3.5厘米，宽5厘米。《浚云河碑记》全文为：

清季，两淮盐运副使徐星槎尝礼佛云台山各寺观，掘渠行舟，自南城至大板隳入海，名曰烧香河。沿河土地渐肥沃，农民利之。民元后，地方官民复于其南辟新烧香河，即今之云河也。沦陷时期，伪盐警管理小板隳水闸。不以时宣泄，河床淤积，年苦水患，农民敢怒而不敢言。胜利后，振汉奉命长连云市

政。以郊垒犹多，不得建设，思先有以利农村也。因请诸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郑西谷署长，以赈粉四百吨，兴工疏浚，三月竣事。计导云河及东磊山东庄关里三支河长凡三十七公里，筑石桥三座。又承两淮盐务局局长费文龙、何维凝两先生先后协助，商定同管小板隳水闸启开事宜，四时盐运，两岸农田不复再蒙其灾矣。主其事者，苏宁分署屠主任耀明、工程稽核丁技工文霖；其测绘、设计、监工，则本市工务局魏科长泽与其役。是时也，苏宁分署又拨赈粉三十三吨，修复小学校舍十六所，筑宋新段市道四公里，特附述焉。工既成，勒石志永。后之君子，倘恢宏斯义从而扩大之，更所望也。丁亥仲秋月铜山张振汉记。

张振汉(1893-1967)，别号炎生，江苏徐州铜山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炮科毕业。1924年任奉军连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8师142旅283团团团长，1930年任第48师旅长，1931年4月23日任第41师中将师长。1935年6月在湘鄂围剿红军，在忠堡战役中被红军俘获，参加红军，亲自操炮投入龙山围攻战，并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在延安红军大

学任军事战术教员；1937年因病脱离红军，病愈后到国统区汉口、重庆经商。1943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6年底任江苏省连云港市市长，1947年4月辞职。1948年12月任驻台湾省特派员。1949年3月加入民革，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参加湖南起义，8月在长沙迎接解放。1949年解放后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5月26日在文化大革命中于北京被迫害致死。1980年2月恢复名誉。

(作者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编辑 邱仕明